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　克　唐元棣　刘敬诚　余品华　黄文松　梅亦龙　丁世尤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克 唐元棣 刘敬诚 余品华 黄文松 梅亦龙 丁世尤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31万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2110·5　　定价：1.26元

出 版 说 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为了正确地宣传他一生的伟大业绩和贡献，学习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我社特组织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三本专著。以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并在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把它推向前进。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历史地位、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恢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同时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若干理论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上、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内容、结构上，作者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

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结合、运用、发展，安排章节进行阐述。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在撰写过程中，本书的作者，发扬团结攻关的精神，反复研究、多次修改。全省哲学界的许多同志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刘学经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八三年九月

53370

目　　录

序言

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
……………………………………………… 马继孔（1）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5）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7）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8）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13）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15）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3）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6）

（一）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27）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中的形成和发展 ……………………………………（33）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45）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45）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47）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特点 ………………………（61）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75）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精神武器 ……………………………………（76）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
新瑰宝 ……………………………………………（80）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潮流的思想
精华 ……………………………………………（88）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92）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93）
（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 ……………（93）
（二）实事求是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的科学回答，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集中的生动的体现 …（100）
（三）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106）
第二节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创造…（120）
（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唯物史观的
根本立足点……………………………………（120）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 ……………………………（125）
（三）坚持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的各种错误倾向…（131）
第三节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137）
（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
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137）
（二）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
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144）
（三）坚持独立自主，要求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革
命精神 ……………………………………………（148）
（四）坚持独立自主，要求按照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

正确地处理主和辅的关系 …………………………(152)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159)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160)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161)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
特殊规律 ……………………………………………(164)
（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167)
（四）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 ………………………(172)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176)
（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化 ……………(177)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和平赎买的独创形式 …(183)
（三）个体生产者的特点和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
合作化形式……………………………………………(191)
（四）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197)
（五）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203)
（六）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205)
（七）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
关系 …………………………………………………(209)
第三节 军事辩证法…………………………………………(212)
（一）战争和政治 ………………………………………(212)
（二）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216)
（三）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24)
（四）战争的全局和局部 ………………………………(228)
（五）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 ……………(232)
（六）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 ………(235)
（七）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 ……………………………(239)
（八）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灭敌人……………………(242)

（九）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245）
（十）兵民是胜利之本……………………………………………（249）
第四节　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257）
（一）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257）
（二）政策和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260）
（三）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265）
（四）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
对敌斗争策略……………………………………………（273）
第五节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辩证法………………（278）
（一）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红和专的对立统一…（279）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84）
（三）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
为人民服务的方向………………………………………（289）
第六节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295）
（一）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296）
（二）党内的民主和集中………………………………………（300）
（三）党内的斗争和团结………………………………………（305）
（四）党和非党……………………………………………………（307）
第七节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310）
（一）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314）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318）
（三）两点论，抓主流……………………………………………（321）
（四）抓中心，“弹钢琴”………………………………………（324）
（五）胸中有数……………………………………………………（326）
（六）波浪式前进…………………………………………………（328）
（七）阶级分析……………………………………………………（330）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丰富和发展……………………………………………(33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
反映论……………………………………………(336)
（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338)
（二）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343)
（三）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348)
（四）“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353)
第二节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是教导人们要善于
分析矛盾和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356)
（一）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的矛盾
问题的精髓”……………………………………(358)
（二）对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革
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
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363)
（三）事物及其过程的矛盾发展具有阶段性……………(367)
（四）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波浪式的”…(371)
第三节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
矛盾的发展”……………………………………(376)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378)
（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384)
（三）“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
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388)

（四）“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393）
第五章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 ……………………………………（397）
第一节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路线……………………………………………（398）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98）
（二）重新确立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401）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
合，正确开展反对“左”和右的两条战线的
斗争 …………………………………………………（404）
第二节　坚持对立统一观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问题……………（406）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工作重点的
转移 …………………………………………………（406）
（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408）
（三）提高经济效益问题是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410）
（四）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 …………………（412）
第三节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两
个文明建设”及其同高度民主建设的
关系…………………………………………………（419）
（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419）
（二）两个文明建设和一个高度民主建设 ………………（423）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425）
（四）现代化建设和阶级斗争 ……………………………（427）
第四节　坚持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理，
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429）
（一）培养和选拔集体接班人是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统一 ……… (431)
（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和实行
民主选举制 …………………………………………… (433)
（三）选举产生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创举 ………… (435)
（四）党的作风和党的性质 ……………………………… (436)
后记……………………………………………………………… (441)

序　言

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

马　继　孔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全党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也就是实事求是。坚持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本身是实与虚的对立统一，认识本身是是与非的对立统一，实践和认识二者之间也是对立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把实践的观点提到首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本质的特征。毛泽东同志正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个本质特征，从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真理的标准、认识的目的等各个方面系统

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认识过程中高度统一起来，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认识的辩证途径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两个飞跃的理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同志这些精辟的论述，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以及认识发展的规律性。

人类认识的发展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认识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② 并且指出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一个随着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基本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它贯串于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革命就是转化，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做转化工作的。我们正在进行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使中国转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物质生活文明决定着精神生活文明，但精神生活文明并不是物质生活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精神生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生活文明。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生活文明对物质生活文明具有决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这个认识是我们党从长期的实践和认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要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使主观和客观符合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重视实践，强调实践出真知，同时也重视和强调认识（理论、风格）的作用。他认为革命没有理论不行，没有一种革命风格来保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不行。因此，我们既要时刻注意不要脱离实践，又要时刻注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刻注意保持好的革命风格，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讲对立统一规律，首先是研究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强调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改造客观世界就得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

力，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调查研究，强调整党整风，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这都是为了改造党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改造整个党的认识能力，以便更好地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实际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从不同的方面共同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如何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这也进一步体现了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紧紧抓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都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这本书，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刻注意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我们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去，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纲领而努力奋斗。

第　一　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正确的理论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它以出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观察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国内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作过很多有益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进一步指明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方向和途径，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大进展和新成果。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极为精确地提炼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决议》还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论的范例。它紧紧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从结合、运用中阐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这种在结合中运用、在运用中结合，在结合、运用中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考察方法，就是党的“七大”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必须遵循的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目前我们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系统和深刻的，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丰富而深邃的内容很不相称，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远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需要。

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加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发展过程和一般规律，阐述它的主要内容和

基本特点，论证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阐明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对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这是摆在我国哲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①就其内容或表现形式来说，哲学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以满足自己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

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列宁哲学思想一样，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精神的精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觉醒起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造成了孕育、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我们离开对于近代和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离开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那就不可能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就不可能了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故乡的根本原因。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理论上的必然表现。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殖民主义剥削的本性，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然要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为此，列宁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而创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

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薄弱环节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胜利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此，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把东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使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东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已经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说：“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

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①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主革命性质的根本转变，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成为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日益落后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炮利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使中国逐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近代中国成了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在中国，除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产生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中国的矛盾和由此引起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629页。

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统治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特别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这些革命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在帝国主义面前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经济无力，政治软弱，因而思想贫乏，没有形成先进的理论体系。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被迫向西方学习，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库中输入了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等思想武器。“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他们用资产阶级的西学、新学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相对立，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产生了一种信念，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由于中国的维新派以庸俗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因而他们所承认和所要求的只是渐进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腐朽、落后和无力了，它的失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8页。

败是必然的。所以，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而统统归于失败，这就不能不使中国人民另找出路了。正在这时，发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起来。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民是"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是通过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认识、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民族问题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对中国人民认识"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同一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改变国家面貌的具体经验和范例。"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更高更广得不可计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量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以俄为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给以极大的教育和启发。

第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农民占多数的沙皇俄国。俄国国情和中国基本不同，前者是帝国主义国家，后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俄国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较低的落后国家，同中国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②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使落后的俄国一跃而过渡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更加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中国人民倍感亲切，鼓舞中国人民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二十世纪初期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历史的新课题，适应时代的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应运而生了。

---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67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8页。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这个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就是：既要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和解决革命任务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经历了一个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际资本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因而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20年前，中国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左右，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已达一千二百万人左右，还有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和其他无产者。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但它有几个优点：（一）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分布较集中，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更早、资格更老。因为它是在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开办企业时产生的，所以，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为强大。（二）中国无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受压迫和剥削的程度之严重为各国所罕见。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受到西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从1912年到北伐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斗争达一百三十多次，充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主力军崭露头角，使“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显示了无产阶级具有坚强的战斗力量。（三）由于中国工人的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因而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四）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久，就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形势，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成了自为阶级，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认识中国无产阶级上述特点至为重要。国外某些人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是“农民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无产阶级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

诚然，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中，但它不是农民运动的产物。正如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农民运动更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农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长期活动在农村环境中，党员的大多数出身于农民，但由

于他们长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又在严酷的战争中受到考验，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深深地懂得，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单靠本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最广泛的革命同盟军。无产阶级实现革命的领导，最基本的是领导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那么，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团结和领导农民，并解决在落后国家中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当然，绝不能用农民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更不能用封建主义思想，而必须用科学的思想来指导。这个科学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要在中国领导农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这个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实践相结合，必然在东方这个农民占多数的大国中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什么"农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组成工农联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哲学是现实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继续和发展。任何哲学的产生，不但需要有一定的现实斗争经验，而且需要以前人已有的理论思维成果为前提。恩格

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这样。"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②

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就其基本内容、体系和本质，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点，就其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范畴、概念来说，它都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而和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基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的理论来源。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把马、恩、列、斯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和前驱，一贯自称是他们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外国传来的，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来的。无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还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如"思维"、"存在"、"实践"、"认识"、"辩证法"、"物质"、"意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统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如“道、器”、“理、气”，“天人感应”、“天道”、“人道”、“天理”、“人欲”等根本不同。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也不是从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中国哲学遗产而独立创造的一种新哲学。国外某些人割裂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儒家哲学”、“孔孟哲学”，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道德经》等，这是违背事实、毫无根据的。

历史事实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

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以及其他社会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晚于俄国，也晚于日本。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当时一些传教士、留学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对《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作过一些片断、零星甚至歪曲的介绍。如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民鸣等人在《天义报》上不完全地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和1888年恩格斯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这种初步的介绍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进行，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思潮。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人，他们中许多人分别从东（日本）、西（德、法等

国）、北（苏联）三条渠道向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由自发走上了自觉。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认识“国是”的精神武器。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接受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开始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作为纯思辨性的学术探讨，而是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所接受的。这个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同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进行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论战；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论战。这三次论战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其实质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这三次论战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广泛的传播，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①。

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

---

①《五四运动的二十年》，载《中国青年》第2期，1939年5月。

哲学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几本苏联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以延安为中心发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了各种学校，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时，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武器，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以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党的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立中国新哲学会，在中央各部门组织学习小组，编写哲学大纲，出版哲学教材。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哲学。通过整风对全党同志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全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产生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如前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优秀哲学遗产没有任何联系。恰恰相反，它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离不开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没有民族的理论思维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料，也是不可能形成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哲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关系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妨碍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中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人类的思想发展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基本理论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范畴的直接继承。在这种情形下，后一种哲学思想同前一种哲学思想同属一个哲学体系，两者没有质的区别，后者是前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深化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就属于这一种情形。另一种是基本理论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范畴的批判继承。在这种情形下，继承本身就是扬弃，继承某种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而加以根本改造，产生质的飞跃，形成新的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就是这样。再一种是对某种哲学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范畴既不是直接继承，又不是从根本上加以批判地改造，而是从各个方面广泛地继承先前的理论思维形式和逻辑材料，吸收营养，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继承就属于这一种情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也是这样。没有这种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就不可能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式为中国式，使之在中国具体化，也就不可能解决通过一定民族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表现中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果看不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联系，看不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独特风格的继承，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从哲学思想的继承关系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没有中国哲学遗产的丰富营养，这棵移植的参天大树也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出丰硕之果。

中华民族是一个擅长理论思维的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

发展中，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传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大哲学家。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第一，哲学和社会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以及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理工农医、诸子百家都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历来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中国历代哲学家大都是政治家，哲学思想政治化、伦理化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历代哲人最关心社会治乱问题，力求认识和研究“治乱之源”和“治世之道”。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传统哲学，其基本原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研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哲学为政治服务，在古代，为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在近代，为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找理论根据。第二，中国哲学著作一般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并多用生动比喻，形象说明。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往往是交相揉合，较少有单纯思辨性的长篇著作。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有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在人类历史上辩证法思想产生最早，中国古代哲人就探求过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几千年来许多中国人从小就受到辩证思维的训练，学习写对联，对对子，如“云对雨、雷对风、暮鼓对晨钟”。过去的诗词歌赋，无不讲究格律、工整对仗。第四，中国传统哲学独立发展不够，在同自然科学结合、反映自然界一般规律方面不如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殊风格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形式（范畴、概念、命题）如“实事求是”、“形而上

学”、“矛盾”、“同”、“异”、“一分为二”等，并赋予新的内容和涵义，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式为中国式。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总结和解决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知和行、理和气即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第三，继承中国辩证思维的优秀成果。如“相反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极必反”、“有对”、“有耦”、“一物两体”、“新故相除”、“变化日新”、“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丰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中，大量的运用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治乱等一系列矛盾范畴，阐述了“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的后发制人、诱敌深入的思想；“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十攻其一”，“示形”，“声东击西”，“兵以诈主”等用兵之道。这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分析了敌与我、全局与局部、前方与后方、主攻与助攻等三十五对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以一当十、以十当一”以及“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十六字诀等等，可以说是在现代革命战争条件下，对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第四，继承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独特风格和民族风貌。毛泽东同志讲话言简意深，论著短小精悍，善于运用哲理性很强的比喻、格言、成语和典故，具体、形象、生动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但它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使它具有突出的中国气派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瑰宝。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相结合的过程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进行、集体完成的；这个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集体创造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经验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任弼时、董必武、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林伯渠、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陶铸等同志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① 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集体作用、集体智慧，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是个人的"天才创造"、个人思想发展史或个人思想言论的总汇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

---

①《邓小平文选》，第159页。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出贡献的许多领导人中，毛泽东同志是最卓越的代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从哲学理论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来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地、深刻地概括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因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集体创造的科学思想成果是公正的。否认毛泽东同志个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杰出作用，同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毛泽东同志成为这一集体智慧、成果的杰出代表，并非偶然。黑格尔说："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① 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除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外，与他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是分不开的。这就是：

第一，毛泽东同志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他出身农家，从小参加劳动，接触劳动人民，以后又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积累了多方面的极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尤为可贵的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社会调查，到农村向农民作调查，到工厂向工人作调查，深入中国社会基层，千方百计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优良的学风，是他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第二，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具有最高的理论修养，有

---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8页。

丰富渊博的知识。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遗产悉心钻研，博览群书，笃志好学。特别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对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他认真地学习、掌握，并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应用，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第三，毛泽东同志具有高屋建瓴、勇于创新、力挽狂澜的气魄。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还具有最大的革命气魄，勇于创新，力排众议，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胆进行新的探索。他勇于为真理而斗争，敢于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或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而代之以经过实践证明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同时他又善于总结党和群众的智慧，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巧妙地贯彻到群众中去。

总之，毛泽东同志有胆有识，既有高度的革命精神，又有高度的科学精神，这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原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奋斗，没有国际国内的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但没有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主观条件，即使有了上述客观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也将会延缓甚至是困难的。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如同任何一门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科学理论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经历了自身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探索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研究其历史分期，必须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一系列独创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那么它必然和党的历史、特别是和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那么，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又必然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基本一致。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然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特点，那么用理论化了的哲学观点的形成或哲学专著的发展来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道理的。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科学分析和阐述，是我们探索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我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

争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具体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1921—1930年）；（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1930—1945年）；（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45—1976年）；（四）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1976年— ）。

尽管毛泽东同志个人早期世界观的转变和他晚年思想中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畴，但为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有必要先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个人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一）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同志不是“圣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青年时期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1911年到1918年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农民家庭，少年“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后来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他来到长沙，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影响，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他除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等撰写的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章外，还较广泛地阅读他们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进化论和伦理学等著作，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启蒙教育，激起了他阅读西方

哲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兴趣，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就读了大量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著作。1913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又进一步接受了从孔夫子到王夫之的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

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中，康德派二元论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对毛泽东同志早期世界观的影响尤大。他读了这本书后，写了一篇《心之力》的哲学论文，受到杨昌济先生的称赞。从他当时所写的《讲堂录》、《体育之研究》等文章以及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来看，他的世界观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①。在论文中，他提倡"贵我"、"自我实现"、"我即宇宙"，表现了夸大自我和精神作用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某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受泡尔生的影响，提出"物质不灭、精神不灭"的二元论观点。在政治上他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后来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思想的大杂烩。……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②可见，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特点是兼容并蓄、纷然杂陈。

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呈现这种"思想的大杂烩"的特

---

①1964年同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谈话。

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点，不是偶然的。这与“五四”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中国竞短争长、交流融合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杂糅古今中外思想的特点，代表了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从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的封建传统哲学。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新文化思想，从康德的二元论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他都有所接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第二，1918年8月到1921年初，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1918年8月毛泽东同志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受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大哲学会，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回到湖南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这时，他已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因而他当时还不能彻底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其它各种主义的界限，还处在比较、鉴别和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说：“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①

1919年12月到1920年夏，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赴北京，并在北京、上海逗留一段时间，这是他的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时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128页

期。这时，他如饥似渴地研究、对比各种理论，清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努力和旧的传统思想决裂。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段话表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迫切心情。

经过艰苦的探索，从1919年冬至1921年初，毛泽东同志终于摆脱唯心史观的影响，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后来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推动他世界观转变的原因有三：首先，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巨大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去北京、上海，受李大钊、陈独秀思想影响很大。同时，留学国外的战友如蔡和森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来信，也对毛泽东同志世界观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其次，"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活动，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决定作用。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学生运动、"自治运动"和"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失败后，他及时总结经验，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另辟通路，另造环境一法”，主张“作长期准备，不与官僚政客争一日之短长”，决心“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革命的实践经验，使他加深了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推动了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再次，“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促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清除思想上的“混合物”，达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中剩取精华”的目的。通过论战，他终于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肖伯纳式的），不是“保护有产阶级”，就是“永世也做不到”的空想，只有“急烈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列宁的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于1921年初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从理论上看，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宗旨，“以俄国劳农阶级专政方法实现改造目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致蔡和森同志信中，赞扬蔡和森主张建立与俄一致的共产党组织“见地极当”，表示“革命非得政权不能发动、保护和完成”，并宣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表明他在理论上、思想上已经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从行动上看，毛泽东同志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手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20年冬天起，他把活动的重点从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毛泽东同志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

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①他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6月同何叔衡同志一起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综观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世界观发展的历史线索和逻辑线索，有如下特点：第一，他“素喜哲学”，爱读各种哲学书籍。第二，他较早地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注重调查研究。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暑假，步行千余里到湘乡等五县作农村调查，后来去北京，沿途又作社会调查。他不仅注意从书本上学习知识，还特别注意“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到实际生活中去“读无字之书”。当时他批判戊戌变法是“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讲话”。他改变出国留学的打算，决定留在国内。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更有益处。”第三，他勇于追求真理，不盲从，不迷信，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搞清楚。他说过：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②。所有这些优点，对他后来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裨益非浅。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②肖三：《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第49页。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中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1921年——1930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是我们党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虽有一定的传播，但基本状况是理论准备不足。当时我们党不懂得并且"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来制订。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针对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分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敌友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以毛泽东同志的两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为杰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最早的尝试和范例。这两篇论著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不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而且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这是第一篇独立分析中国国情的有分量、高水平的著作。《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为农民说话的答辩书，第一次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深入湖南农村作了三十二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这一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初步论述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显示了萌芽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人从注重学生运动到注重工人运动，再到注重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并把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革命实践中的一次新的突破。党重视农村这个广大的革命阵地，充分认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表明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已逐渐深化，这就为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7年“八七”会议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必要，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湖南、江西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局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某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1928年至1930年期

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结合的问题。

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著作。首先，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理论，表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已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即在总体上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有了正确认识，提出了实现革命任务的道路、战略和策略，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其次，它第一次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的著名论断，深刻地论述了“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的重要性，批判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最后，它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可见，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已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

面的内容，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1930年——1945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后，一方面经历了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和多方面展开的过程；另一方面经历了逐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识和掌握，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过程。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而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全党认识了王明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主观主义的危害性，也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这是党的历史上重大转折。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算。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更好地总结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以便正确地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为了从思想上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需要全党同志重视理论研究。毛泽东同志后来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①。

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党不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革命斗争，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中，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批判了战争指导思想上的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继续，也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前导。

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最重要的文献。它不仅在中国人民中间，而且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两论”抓住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抓住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把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两论”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作了深刻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对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透彻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达到完善和成熟绝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既要求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

了进一步发展、深化的现实条件。一方面，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党对军事、政治、文化、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这就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由于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未彻底肃清，尚能迷惑一些人，并且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入了我们党，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未完全入党，因而党内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所以，端正党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关系到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党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进行比较、鉴别和概括，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提供了现实条件。特别是三十年代后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使毛泽东同志能够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主观努力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艰苦环境和繁忙工作中，挤出时间发愤攻读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一切国内外哲学著作。斯诺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毛泽东同志不但自己研究哲学，而且还劝别人学习哲学，并组织、召开哲学座谈会，倡议成立“新哲学会”。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该把学习哲学作为我们推动革命前进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受到干部和学员的热烈欢迎，对推动广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系统化、完整化。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同在延安时期写作的军事辩证法、政治辩证法、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等著作一起，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多方面展开的丰富内容。毛泽东同志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不仅是杰出的军事著作，而且是精湛的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军事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67—68页。

辩证法的最高成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论政策》等著作，标志着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政治辩证法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则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光辉范例，是对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

延安整风运动是对党员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全党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分清了思想、政治和理论的是非问题，从而一致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逐渐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表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业已成熟和体系化了。“七大”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革命理论的正式确认和命名，说明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45年—1976年）

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过四年多时间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反动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从1957年起，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一个生产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这是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为了使全国人民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在全国人民中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活动。1950年12月，党中央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党和人民遵循《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6年，我国人民取得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创造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的独特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及其它许多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时期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经验，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精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独创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全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因而“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956年到1966年，我们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虽然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对三年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有所察觉，并开始作了认真的纠正。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由于当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左”的错误，因而主观主义也就没有得到有效地纠正，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终于酿成了从1966年

到1976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并不象有人说的那样，是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包含着所谓错误的“因素”、“杂质”。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晚年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正是由于他违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造成的。

第四，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1976年——　　　）

1976年10月，我们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中国。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在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8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在思想上，三中全会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纠正了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在政治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防止在注意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取得了很多极其宝贵的新

鲜经验。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既对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廓清了道路。

1982年9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十二"大所确定的关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关于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关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目标、关于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基本要求……等等，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地运用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的科学成果。它表明我们党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也大大加强了。毫无疑问，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指导中国人民赢得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胜利，同时它自身也必将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

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表述，我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定环境中的运用和发展，是在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这个表述中，既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又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共性中的个性、普遍性中的特殊性的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意义和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一个体系。正如列宁主义哲学不存在单独体系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不存在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外的体系。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独具特色和风格的，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中，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辩证法、党的建设的辩证法、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这些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展开，是对具有生动壮观、复杂多样内容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辩证过程在理论形态上的总结和升华。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一系列哲学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认识论方面：科学地阐明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地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提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原理，概括了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突出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等。在辩证法方面：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的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矛盾分析的方法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提出了事物及其过程的矛盾发展具有阶段性的思想；论述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性等。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精

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独创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和群众路线的理论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它一切哲学相区别的基本特点，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各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特征。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哲学思想都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个共同特征。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然是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普遍性，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特殊性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特殊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普遍性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共同本质指导下形成的。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的共同特征，孤立地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殊性，那它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固然是它区别于马、恩、列、斯哲学思想的特殊性，但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本质、普遍性的特殊表现。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中的特殊性，统一性中的差别性。

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共同特征指引下开辟了什么新领域，创造了什么新经验，提供了什么新方向，在哪些方面比前人有新的进展和突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环境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传统，但它又不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保存，而是犹如一条生命洋溢的洪流，离开源头愈远就愈开阔、愈发展。最晚出、最新近的哲学思想往往更深刻更丰富地反映它所渊源的哲学的传统特色，即寓于它内部的普遍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最晚出、最新近的哲学，因而它也就最突出、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地、系统地中国化。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其它特点都是从这个基本特点衍生出来的。所谓“中国化”，主要不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派、风格、语言”，而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① 他还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集中全党智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这一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③ 周恩来同志也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④

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点上，才能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基本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其所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是马克思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页。

主义哲学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是由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由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相结合的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特殊性决定的；再一方面，二十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曲折性、艰巨性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特点的形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的最本质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人类认识发展的这一规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遵循的内在逻辑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都在自己的时代遵循这一规律，承担起各自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及人类精神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在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铸造了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任务。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理论工作，他们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伟大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规律和范畴，无论是哲学的自然观、科学观、历史观，还是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都已作了基本的阐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坚持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还只限于西欧少数国家和历时不长的几段历史时期，并且总是以斗争的失败而告终，因而这种结合不可能全面和深入，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就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前进了一大步。列宁的历史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实践经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要解决如何从一国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的问题。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复杂斗争，要求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更高层次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求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列宁对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战士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

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担当起了这个艰巨而崇高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列宁之后从事革命活动，从他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时起，就处于革命斗争实践的中心。这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业已创立，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不是创立另一种新哲学，而是“有的放矢”，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结合的新方向。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作箭和靶的关系，用“有的放矢”这一通俗而生动的语言，极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同样具有国际的典型意义，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革命，提供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光辉范例。

第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与欧洲各国不同，而且同俄国也大不一样，具有极大的特殊性：㈠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在世界上举足轻重。㈡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基本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群众是农民，在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无产阶级如何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如何建党、建军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㊂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状况，敌人异常强大残暴，掌握着全国政权、经济命脉和交通枢纽等，得到世界主要反动势力的援助，而革命力量弱小，被迫处于农村、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得不到任何国际援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非坚决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可。㊃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但国内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国际环境也十分复杂，形成了一个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所没有的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矛盾焦点集中表现的地区。同时，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于前殖民地印度，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许多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霸一方，处于不统一状况。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之间的不统一。这就便于革命人民利用敌人的不统一，促进革命的发展。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占优势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并存；半殖民地的近代化的若干大中城市和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并存；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同时并存；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并存；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两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并存。㊅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㊆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民族，而且是一个以刻苦耐劳、聪明智慧、酷爱自由著称于世的民族……等

等。

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同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显得非常突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必然带有新的特色，无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还是实践的内容和条件都不能不带有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有如此众多特殊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就不能不带有新的特色。因此，对这种具有特色的“结合”所获得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就不能不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三，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曲折性、艰巨性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几十年间，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处于高潮，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一时期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紧密结合的直接结果。在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对指导和支援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作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因而对各国革命的指导存在着脱离本国实际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

示，指导中国革命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只“从本本出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和中国党内王明等人违背这一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另外，二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了由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卢卡奇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创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起初自称是为了探讨1918——1920年德、意、匈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明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未能不失时机地以无产阶级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而代之，同时，也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想从辩证法中找出路，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可是，他们又过分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个时候，卢卡奇、葛兰西等人还没有完全脱离本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卢卡奇、葛兰西理论中的主要错误，形成了和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流合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以“革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行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之实。它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变成一种脱离工人运动、脱离革命实践的学院式的空洞理论，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本质特征，代表了二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世界观、方法论，总结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鲜经验，在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列宁逝世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典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鲜经验的哲学概括。象毛泽东哲学思想如此突出、如此集中、如此系统、如此深刻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把它应用于实际工作的一切领域，使它在东方大国中具体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得到普遍地应用和推广，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就必须使它中国化、具体化。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仅仅是一般的理论原则，是观察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为任何国家的革命、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提供在中国怎样进行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现成方案，而只是提供了认识论、方法论的工具。第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欧洲，它的内容是通过欧洲民族形式表现的，因而它从思维形式到语言风格，从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到回答这些问题所依据的革命经验，都必然带有英、德、法等国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法兰西阶级斗争》是直接研究欧洲问题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也主要

是依据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作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同样，列宁的著作也是以俄国为中心讲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作具体的论述。第三，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欧洲各国相比较有极大的特殊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近代中国科学文化不发达，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而哲学本身又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它需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通过具体科学和具体经验才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所以，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不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那就不能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化。所谓系统的中国化，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地准确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欧洲式变为中国式，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代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我们党的经验是：

第一，要研究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民族特点，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向全党同志提出的要求：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注

重研究中国的历史、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①。

第二，要重视对于中国革命具体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就是说，“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②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发，用中国革命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中国的党员，这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才能通过切身的感受更好地向中国人民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效果。刘少奇同志说：“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那就要使我们再走许多弯路，再受许多挫折。”③对于外国的经验，我们应当重视，但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

---

①《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引自《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2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2页。

条，只能借鉴，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有了丰富的经验还要善于总结，使分散的经验带上条理性，上升为理论。只有使感性认识深化，发展到理性认识，才不致于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而犯经验主义错误，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原理、新结论。

第三，要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实现真理。即“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①”。长期以来，我们党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而且化为各个领域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也就是“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的过程。”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要具体地实际地运用它，不仅要向人民群众说明真理，而且要有动员人民群众实现这个真理的具体办法。只有这样，才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掌握，化为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是坚持真理、实现真理的典范，是实现世界观和方法论、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统一的典范。例如，由于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因而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启发农民觉醒，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称赞了农民群众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并加以系统地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施办法。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理论在中国具体化了。

---

①《周恩来选集》第335页。

②《周恩来选集》第338页。

第四，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形式变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派和中国作风。为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仅要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来加以深入浅出地论述，而且要密切联系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经验，联系民间的格言、故事、传说，联系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遗产加以生动活泼地阐明。就是说，从思想内容到表达形式都要实现民族化。如毛泽东同志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表述物质第一性与意识第二性的哲学基本问题，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又完全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长期奋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说："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①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艰巨的事业，"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

---

①《周恩来选集》第337页。

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① 我们认为，这段话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较好的概括和说明。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除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地系统地中国化这个基本特点外，还具有由这个基本特点所规定的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同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直接论战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同实际工作中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一个新特点，是哲学中两军对战的新的表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由理论变为现实，由科学的预想变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无产阶级革命已在一国取得胜利，并且将继续在其他一些国家取得胜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正确与否，即主观认识、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兴衰成败，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渗透到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总是以科学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精神和物质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作为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反对主观主义提到突出的地位，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哲学思想。“主观主义”一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过。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已经察觉到主观主义对革命运动的危害性。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中也谈到“主观主义”，并从哲学认识论上对主观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列宁指出：“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① 但是，列宁还没有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一环，作为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认识根源的根本措施。列宁只是把主观主义等同于一般唯心主义，还没有把它作为实际工作中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来进行分析和批判。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对主观主义进行系统的深刻的哲学批判，这一历史任务，是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实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715页。

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必须同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和我们党内贻害非浅的主观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同志正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深刻地系统地全面地揭露和批判了主观主义的表现、特征、实质、根源和危害，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精辟地阐述了什么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主观主义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同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有所不同，它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主观片面性、主观盲目性、主观随意性、主观偏颇性。它的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主义在思想认识上既表现为教条主义，又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政治路线上既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又表现为右倾保守主义。

其次，深刻地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观主义无论是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还是以经验主义形式出现，其根源都是由于违背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割裂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右倾保守主义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左”倾冒险主义则相反，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也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

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只有避免认识的片面性，才能克服认识的主观性。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在指导人们研究客观事物时，要求人们不要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赖以存在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同志着重分析了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①教条主义者由于“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因而必然脱离实际，脱离客观条件。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曾说过：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

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地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认识根源，而且指出主观主义特别是表现为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革命中长期泛滥而得不到克服，就是因为有产生它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又有许多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因而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思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想进党来。他说：对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

再次，严正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由于主观主义的认识不符合实际，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它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对工作的指导都是错误的，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致使革命工作遭到严重挫折。鉴于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主观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同志把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创。

最后，科学地论证了纠正主观主义的办法。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①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②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③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② 这三条就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基本方针的雏形。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党中央于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一方面强调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倡干部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另一方面又强调全党同志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总结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着手，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左"倾和右倾错误，使广大干部、党员从切身经验中认识主观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划清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界限。在整风运动中，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和风细雨，从容不迫，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开展党内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主观主义、改造世界观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对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起了重要作用，其意义极为重大。㈠他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分析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不仅从政治路线上，而且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地指出主观主义是一切"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指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做好各项实际工作避免犯"左"右倾错误的关键。这比起列宁对机会主

义的批判前进了一大步。㈡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化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化为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就使群众易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促进了哲学的解放和普及。㈢他在同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作斗争而形成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既是对我们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要犯错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这就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批判了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㈣他阐明了共产党人反对主观主义、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是无止境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克服又不断产生中运动的。因此，主观主义永远会有，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少犯或不犯错误，就要切实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数经验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的任务永远没有完结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对于开创新局面，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不能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开辟了哲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方向，取得了相结合的新经验、新成果。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①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创立了军事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创立了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运用于指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法；运用于指导、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等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创

---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立了关于自然发展的自然辩证法，创立了关于思维发展的思维辩证法，创立了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经济辩证法。毛泽东哲学思想则创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军事辩证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法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新领域。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学说，则是对马克思、列宁的历史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因有专门章节论述，这里略谈三点：

（1）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它富于独创性，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果。它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发表为成熟的标志。由于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从对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作哲学概括开始的。它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实践，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中人与物等各种对立统一关系，总结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军事辩证法的高度作出系统的科学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极高成就。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如此杰出而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战争的实践，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的经验，经过研

究和总结必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中国有丰富的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学说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也是形成卓越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不仅是研究现代战争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而且对各项工作也都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学习毛泽东同志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如何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等等，这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极有教益。

（2）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把解决路线问题和贯彻执行路线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溶为一体，化为一整套的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马克思提出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治学方法，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没有从认识论高度专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政党时，对此作过一些阐述，但没有提到认识论高度作系统地总结。毛泽东同志不但精辟地论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如何的统一的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一系列具体而丰富的工作方法；不但论述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普遍性，而且论述了工作方法的系统性、层次

性；创立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一整套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写有专门论述工作方法的著作，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建国后随着革命历史任务的发展变化，工作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58年毛泽东同志将过去积累下来的工作方法和新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撰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同志说：写这篇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1961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做好工作必须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在其它大量文章、讲话中，也都多次讲到工作方法问题。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实践经验，批判了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性质和情况不同，二者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但基本方面是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始终，是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社会主义

社会也不例外。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解决矛盾的途径、方法也就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逐步完善和自觉地调节而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两种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群众化、大众化的解放哲学。

哲学群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必然规定，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深化的结果。哲学的根本变革，要求哲学的解放。由于过去各种哲学都以人类思维活动为中心，因而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这种哲学“至多不过是说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实践提到了首位，使哲学成为劳动群众解放的思想武器，革命行动的指南。这就要求哲学从过去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面向广大群众，由少数人垄断变为由多数群众所掌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哲学解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努力加以实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大大推进了哲学的解放。哲学的群众化、大众化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哲学掌握群众、深入群众的程度，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在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要达到“解放中国，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战斗。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就得有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武器，这就要普及哲学，使哲学群众化、大众化。因此，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哲学的解放问题。他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伟大号召，反对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他一贯强调学习哲学对于端正思想，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少犯错误，对于实现革命和建设任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他发展了列宁“伟大的认识工具”的思想，强调哲学就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指南，如果辩证唯物主义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以及广大革命分子所接受，那么他们就会得到一种最正确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同盟者，战胜各种反动思潮，采取正确的行动，达到解放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目的。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为了推动哲学的普及和解放，毛泽东同志还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实际思想情况，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有些人就没有学过哲学，是实际的唯物主义者，做起事来很正确，因而学不学唯物辩证法没有什么必要。毛泽东同志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人们在实践中虽然也能学到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那样的完备性和深刻性，就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环节，不能处理好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而仍有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必要。另一种错误观点则认为，哲学深奥难懂，一般干部、群众难以学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当破除对于哲学的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东西，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有一些社会经验（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经验）就能学习和掌握哲学。尽管人们日常所了解的哲理还处于零乱的常识状态，但是对这种常识性的哲理加以整理和提高并不很困难。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掌握科学的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就是说，哲学并不神秘，即使文化低也是可以学的。

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哲学望而生畏，感到难学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要是没有一本善于以通俗的语言，讲切身经验的哲学书。他认为这种好的哲学书总是会有的，他自己也有兴趣去写这样的书。事实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就是哲学群众化、大众化的典范。他善于根据群众的切身经验，把抽

象的哲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典故等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如用“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两条腿走路”、“两点论”、“两分法”、“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来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使广大群众易于领会和接受。

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不但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而且在解放军战士和城乡工农群众中，都展开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哲学这门“使人聪明的学问”，大大提高了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已广泛地深入人心，在群众中扎根，成为他们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尖锐武器。“主观”、“客观”、“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主观能动性”、“矛盾”、“一分为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哲学概念，已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最常用的词汇。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它们，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活，这话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上述三个特点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本质特点的。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和它本身的特点密切相

关，又和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中国革命对于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可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是要科学地阐明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起的指导作用，阐明它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二是要正确地阐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阐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的独特的贡献；三是要准确地阐明它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史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阐明它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对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实际意义。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精神武器

科学地确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关系到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和根本利益的大事。《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旗帜。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没有自己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是不可能的。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础，就谈不上统一的行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和建设一直是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止共八十年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尽管英勇顽强，艰苦卓绝，风起云涌，连绵不断，但是一次一次都失败了。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党一开始并没有解决。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也就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使中国革命在黑暗中摸索，有时甚至陷于绝境之中。只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之后，才在这个科学思想指引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势如破竹地取得革命的节节胜利。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对国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的，从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158—159页。

地位，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只有掌握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决议》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则是贯穿于上述六个组成部分中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浑然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各个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党建等各方面的运用、发挥和展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运用的典范和科学成果。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概括和理论升华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对我们的各项工作具有长期的普遍指导意义。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愈益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相结合的实践经验的

哲学概括。因而，它不但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活的灵魂，而且也是我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用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他们过去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和它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巨大的指导作用，和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认真地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以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它就不一定适用了；也有人以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来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观点和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有人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甚至不愿意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种错误。这种任意拔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观点和态度也完全错误的。这两种看法和态度都违背了历史和逻辑一致、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们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

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切积极成果，特别是作为对一切积极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加以科学地运用、丰富和发展。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瑰宝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直接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备的科学的世界观，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它的理论宝库中已经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列宁、斯大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不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和新鲜的经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随心所欲、主观自封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同志是继马、恩、列、斯之后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理论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优秀、杰出的哲学思想之一。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中，它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

后人类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胜利的记录和思想武器。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列宁哲学思想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同，都属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如同列宁哲学思想一样，占有十分突出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时代的主体既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由此而决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线也有两翼：一翼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突破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翼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胜利。这两方面的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构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潮流和斗争的全部内容。同样，对这两方面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认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包含列宁哲学思想，也包含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哲学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不同，又和列宁哲学思想有所不同。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不因为它和列宁哲学思想同属一个历史时代，就不能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同又有自己特点的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相反，正因为它和列宁哲学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才构成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部生动、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二十世纪继列宁之后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历史潮流。它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之精神体

现，又是经济落后国家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这一历史事实和历史必然性的哲学论证和结晶。

自从本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就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转移到不发达的国家。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和一批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经济落后国家领先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几乎都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依赖国外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依赖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剥削。它们用获得的超额利润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并采取了一些福利措施，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由于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使被压迫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激化，成为当代各种矛盾的焦点，促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日益觉醒，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增长，出现了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出现了先进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这就为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前提。特别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又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无产阶级革命就

有可能从这里突破，经济落后国家就有可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曾设想社会主义将先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可是在他们的晚年却提出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问题，并对俄国的革命寄予很大的期望。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还无法预测到经济极其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可能先于帝国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景。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来，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① 列宁在1913年就注意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②。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时代，都使无产阶级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获得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③。这就是二十世纪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和亚洲革命风暴相结合，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相结合，必将揭开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展开人类历史的新画卷。正因为这样，体现这个伟大时代精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就理所当然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

---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第439页、440页。

面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这里从总体上略述以下几点：

第一，它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但要求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且要求通过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理论正确与否，不能在理论范围内解决，只能在实践过程中加以证实。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德意志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西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它是不是普遍真理，是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还需要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继续加以证实，特别是在东方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实践中受到检验。

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应当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以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因为"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至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处于停滞和腐败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史诗的伟大纪录，它的产生最好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可以同东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相结合，并由可能性变为现实。中国人民奋起斗争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辉煌胜利的事实，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普遍性。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证明的科学真理。它为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途径和方向的范例。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别具一格的贡献。

第二，它不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一真理。

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说明，马克思学说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不同国情的国家是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的。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要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马克思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必然开辟社会主义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新经验、新成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果。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指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新方向、新道路，为落后国家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三条道路问题。一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武装斗争（实际是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二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三是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而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三条道路提供了二十世纪不发达国家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对这三条道路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贯穿于这三条道路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不发达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些新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内容，开辟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新领域，如军事辩证法思想，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历史辩证法（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特别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等等；另一方面是使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许多概念、原理进一步精确化、系统化、深刻化，例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相联结的矛盾精髓等等，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它适应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满足了时代对哲学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突出主观能动性在革命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着重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突出主观能动性相联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等等。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必然带有的浓厚的时代色彩。

第三，它大力促进了哲学的解放，使哲学从课堂上和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哲学，因而它必然要求哲学自身的解放。哲学解放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哲学解放就是使哲学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群众摆脱长期所受的精神奴役。为此，哲学必须大众化，克服从抽象概念到抽象概念，故弄玄虚，脱离实际的弊病。哲学不能仅限于理论论战，而应当与群众的实际斗争相结合，研究现实生活中不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哲学的解放过程，也就是把哲学变为现实、变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的过程。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群众化、大众化的哲学，是哲学解放

的典范。它既能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也能为不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未曾见过象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样广泛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工农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先例。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哲学得到如此规模的普及和宣传，如此深入人心，为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同时，也从未见过象毛泽东同志这样自觉地把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化为一系列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化为千百万人共同行动的准绳，从而提高了全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哲学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潮流的思想精华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重申"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它们在历史上有过相似的苦难经历，大都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支援了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对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进行民族独立和

人民民主斗争的突出贡献。

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而且拥有丰富的资源，还扼守着世界的战略要冲，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这些丰富资源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依赖的对象，战略要冲则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必争之地。战后第三世界独立国家已扩大到126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大大加强，在当今世界外交斗争的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可信赖的朋友，站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第一线。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还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总结的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人民军队实行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等三大法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团结全民族的战斗纲领。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这些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极其珍贵的。

为了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

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实现这一革命转变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在夺取政权后，为了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开辟了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经验，可供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参考和借鉴。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共同任务和普遍规律。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然面临的问题。开历史之先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向第三世界人民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意义。从根本上说来，它的普遍意义在于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走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乃至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经验，在于它提供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于本国实际，就能做到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道路的基本方针。

如果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不一定统统适用，那么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却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然，第三世界各国学习和运用中国的经验也必须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正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谛。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从事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俄国，有它自己的很多特点，因而我们党一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就遇到了其他国家所没遇到的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要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的复杂的问题，就必须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锤炼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决议》中明确指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原

则，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之所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就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必然产物，是独创性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在长时期的敌我力量悬殊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不坚持独立自主、把方针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那么，革命力量就不仅不能发展、壮大，而且一天也很难存在下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它们具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特色，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这个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多方面的内容。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内容。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

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

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 “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颜师古曾对“实事求是”作过这样一个注解：“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原意是指一种根据事实求索真知的踏实学风。经过毛泽东同志新的解释，赋予了这句古语以既唯物又辩证的含义。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客观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党校的题字，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这四个字，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精华。他还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②这就是说，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又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包括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内，都贯串着实事求是这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根红线。《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内容的集中体现，而这两部著作的根本思想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论》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一切正确认识，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并且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矛盾论》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矛盾的思想，人们思想中的矛盾是客观矛盾在头脑中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矛盾及其发展变化。《实践论》、《矛盾论》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批判了主观主义，完整、系统地阐明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辉，体现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和精髓。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离开了实事求是，就根本不会有整个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是在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我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这就说明，实事求是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即哲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会有整个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视为共产党手里“最尖锐最有效

的武器”。并且公开申明共产党人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①。回顾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六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充分证明，实事求是确实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前进；反之，违背实事求是，搞主观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我们的革命事业就遭到挫折，导致失败。1924年至1927年，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特点出发，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与广大农民建立了革命同盟，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坚持从中国的社会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主观主义地估量形势，错误地决定政策，拱手让出革命的领导权，恣意污蔑农民同盟军，完全丧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因而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了失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分析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

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正确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实现了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王明不从中国国情出发，不顾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大搞本本主义，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因而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使革命陷于绝境，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极其危急的情况下，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唯物辩证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正确地决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胜利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其基本内容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际工作的一切领域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党着重检查和批判了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王明的主观主义，因而使同志们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懂得了坚持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就使革命取得胜利，搞主观主义就使已经得到很大成功的革命重新归于失败，懂得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又是怎样在千难万险之中使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这样，全党同志就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懂得了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道理。经过这次整风运动，使全党进一步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我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我们党又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仅仅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由此可见，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条真理不仅为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也为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正确地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国经过短短七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我们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上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时离开了实事求是，发生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因而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特别是发动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同志违背他自己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导致犯了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自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但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而且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工作中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归根到底，也还是由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使各项工作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永远牢记这个基本结论，永远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二）实事求是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集中的生动的体现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和极其深刻的命题，它集中地、生动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完整、准确、精辟的概括和表述。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生动体现。它以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语言，科学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能否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肯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肯定物质和精神具有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和精神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世界是可知的。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实事求是，言简意赅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回答。

首先，实事求是承认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就是要求人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坚持唯物论，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基本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实事求是时，首先强调“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强调认识和解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列宁在给物质下定义时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①哲学的物质概念概括了千差万别事物的共性，即客观实在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的观点，就是列宁的“物质”的观点。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出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

其次，实事求是不但肯定了人们能够在实践中能动地认识世界，而且肯定了人们能够以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向导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之别，而在可知论中，又有唯心主义可知论和唯物主义可知论、直观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之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可知论者，虽然也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但他们却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颠倒了。直观的唯物主义者虽然也肯定世界是可知的，但由于他们不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因而他们的可知论只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消极的、静止的反映论。马克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认为人们的思维不仅可以在实践基础上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还能依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又在实践中能动地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实事求是，正是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他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一观点是以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可知性为前提的，只有承认世界是可知的，确认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才有可能通过实践去"求"。"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求出规律性来，以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简明深刻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既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也同旧唯物论区别开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中国化的最精辟的科学表述。

实事求是又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是按照事物本身固有的内部联系，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努力地探索和掌握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讲的"求是"，就是要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① 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的态度和方法。

要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最根本的是要深入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是通过各个特殊性表现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不仅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种对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离开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书，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典范。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亡国论者认为，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速胜论者认为，中国很快就能胜利，无需乎费大气力。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法，对矛盾着的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了具体、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759页。

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① 这就彻底驳倒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特点的分析，对矛盾存在和发展的特定时间、地点、条件的了解，认识和把握了抗日战争这一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这种对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辉。

实事求是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过程。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要认识客观事物，就要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之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实事求是。

人们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个多次反复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在分析这个过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认识的源泉、目的、认识发展的过程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说明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7—418页。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怎样做到“实事”即从客观实际出发呢？就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作调查，获得丰富的、系统的感性材料，这是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性认识而到达于理性认识。要真正做到“求是”，就必须将详细的系统的材料加以思考，通过分析和综合，引出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理性阶段，也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但人们在这个飞跃中得出的理性认识是不是真正的“是”，即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性，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必须将得到的理性认识返回到实践中去，对它进行检验。正确的认识起指导实践的作用，错误的认识在实践中得到纠正。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也是意义更为重要的一次飞跃。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是这样，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实事求是正是这种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的集中的生动的概括。

实事求是也是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创造者，离开人民群众就根本谈不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实事求是是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这一点我们将在群众路线一节中着重阐述。

总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成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和活的灵魂。

（三）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解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这个基本问题，认为只有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知和行相统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去办，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等由于脱离中国社会情况，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造成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分裂，先后犯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因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

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逐步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解决了革命的敌友我这个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指出：要有一种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要求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批评一些同志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耻辱。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非常明确地把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当作关键问题提出来。他认为要比较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这个"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基本要求不仅适用于战争，同样也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的工作。因为违背了"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原理，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就会在实践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以致受到历史的惩罚。

毛泽东同志讲的"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事求是，就是要不断地克服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求得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具体的统一就是主观认识必须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具体实践相符合；历史的统一就是主观认

识必须随着具体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符合。如果客观过程已经向前推移，而主观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那末，本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也会变成不符合客观实际了。这就叫做思想落后于实际。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因而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如果不能及时地意识到这种情况，老是使自已的认识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上，就会犯右的保守主义的错误。相反，如果一个具体事物的具体过程尚未结束，还不具备向新的具体过程转变的条件，人们的主观认识想要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可能做的事情硬提到当前的行动日程上来，就会犯“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解决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对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多方面的深刻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一，以实践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实践中要获得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必须善于从实际出发，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实践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过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科学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调查了解情况，属于感觉的阶段。认识过程的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进行研究，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正确的认识来。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认识论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调查研究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统一的生动体现。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对认识的对象进行充分的调查，掌握客观对象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才能提供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而只有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研究，即经过认真的“求”，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达到“求是”的目的。可见，从实际出发，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还反复强调，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也必须随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断反复地进行。在实践和认识的每一次反复中，都可能会出现新的情况，发现新的问题，获得新的经验，这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和研究，使人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革命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随后，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更是痛切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对那些脱离实际，“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的人大声疾呼：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总结我们党二十年斗争的经验，提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

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并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①

总之，以实践为基础，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它为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能做到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指明了一条科学的途径。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仍然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为了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作一条基本的思想原则，告诫全党同志务必始终坚持。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世界上的事物和过程都包含着矛盾，这是它们的共性，是无例外的，因而是绝对的。现实存在着的每一具体事物的矛盾又都有它的特点，这是事物的个性，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因而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普遍性不能离开特殊性而存在，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特殊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而存在，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毛泽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东同志精辟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的哲学基础。

既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那么，在认识上就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这种联系。所谓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找出具体事物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联系，从而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如果只抓住一个方面而丢掉了另一个方面，就必然陷于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同志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性，不注重特殊性，而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结果犯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另一些同志则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夜郎自大，满足于一孔之见，结果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同这两种错误倾向斗争中，特别是在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① 刘少奇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全党同志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彻底反对教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500页。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联系呢？毛泽东同志说：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很好地联系起来，既能掌握住事物的共同本质，又能掌握住事物的具体特点，也就能从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内部联系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没有这种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③正是因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三，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看问题，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反对主观主义。

只有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去“求”，去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

---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律。所谓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就是对具体矛盾作具体的分析。列宁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我们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活的灵魂，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离开了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就等于丢掉了实事求是，就等于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事物的矛盾是复杂的，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都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① 既然客观事物的矛盾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那么我们研究问题就要力求做到客观、全面，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如果只看正面、不看反面，只看局部、不看全体；或者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或者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或者不加区别，一刀切，一风吹，等等，都是同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同志把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以及一切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东西，统统叫做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267页

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主观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到实事求是，保持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们的主观是不是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从客观实际中是否求得了"是"，这不能由我们的主观判断来决定，而要看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毛泽东同志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只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我们的一切理论、计划、方针、政策和办法，都必须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证明其正确与否，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实事求是的最后归宿就是要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按照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也就是检验我们的认识和行动是否达到了实事求是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成功，就证明我们做到了实事求是，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如果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遭到了失败，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还没有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被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如果离开了实践的检验，不能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这就说明“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两个凡是”一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实事求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离开了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检验，就不能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真正求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即规律性来，这是一件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就一定能够求出这个“是”来，胜利地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第五，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在实践基础上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

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这就告诉我们，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想和做两个方面，无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离不开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又说：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人类不但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能够改造客观世界，这种自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和努力，就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是辩证的统一。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应该立足于客观规律性之上；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性，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反过来，又只有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性，做到实事求是。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这就是说，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思维和从事革命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充分发扬这种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能动性，是达到实事求是，从而获得正确思想和从事正确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发扬得越充分，就越能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自觉和盲目是对立的。自觉性建立在认识客观规律之上，而盲目性却总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带着盲目性的。盲目性越大，越不尊重客观规律，就越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在主观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去发挥能动性，就只能是主观蛮干；把自觉能动性夸大到超过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限度，就会陷入主观主义。这种主观性、盲目性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有很强的党性原则，要有一个老实的态度，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没有这样一种老实态度就不会有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没有老实态度的人常常为着自己的需要而弄虚作假，谎报成绩，隐瞒错误，可以办得到和应该办的他们不去办，办不到的和不应该办的又偏要去办，抱这种态度的人就不可能发扬正确的自觉的能动性，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需要有很大的革命勇气，才能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的能动性。没有党性原则，前怕狼后怕虎的人，不可能坚持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刘少奇同志

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① 很多时候，要不怕得罪人，不怕遭到别人的反对。如果只想当个“老好人”，不敢讲真话，遇事不摇头也不点头，那不仅不能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而且有害于革命事业。

再次，就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党性、立场问题又总是和观点、方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党性很强，立场坚定的同志，由于观点和方法发生问题，也往往不能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也常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每个同志都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使自己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善于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既包括了坚定的党性、立场，又包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方法。我们只有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到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统一，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② 在战争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大力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去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去夺取

---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革命事业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的能动性，去“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去夺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第二节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创造

（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立足点

我们党长时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总结了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路线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典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独特的创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向前发展和新陈代谢的历史，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则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要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就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谁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

无往而不胜；谁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群众路线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是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深刻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我们的一切党员和干部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这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也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为什么说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呢？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者，同以往一切剥削制度下的统治者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以往一切剥削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群众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可以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者，他们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他们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坚持和实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以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基本准则。毛泽东同志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人民群众既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理所当然地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人，而革命政党和革命干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996页。

部则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当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工人阶级的政党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它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①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向人民负责这个最彻底最坚定的革命立场。只有确立和实行这种彻底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我们的革命事业才会有明确的方向。我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能否取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看它是否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有内在的联系。人民群众总是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对未来提出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要求，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又总是同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所以，"一切为了人民"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它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一切依靠群众"，是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唯物史观肯定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6页。

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就会落空。

要真正做到一切依靠群众，首先就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条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身上的枷锁，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打破；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创造①。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不能仰赖"神仙、皇帝和救世主"的恩赐，只能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归根到底，只有人民群众从事的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科学实验才能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只有真正地坚定地信任人民群众才能全心全意地、毫不动摇地去依靠人民群众。

要真正做到一切依靠群众，就要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②。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做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

---

①《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②《与斯坦因的谈话》，转引自《中国青年》1950年第47期。

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①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因此，每个革命干部都应当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时刻注意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不懂得这一点，所谓一切依靠群众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要真正做到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这是第一步，也就是发动群众。"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这是第二步，也就是组织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是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继续。"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②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还得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既要关心群众生活，又要注意工作方法，这是一门很重要的领导艺术。只要把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抓好了，依靠群众就落到了实处，群众路线就会显示出无穷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7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2页。

的威力。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制定出合乎客观规律、适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办法，并且能够把这些方针、政策、办法变为广大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观点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归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个大字，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为什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成为我们党进行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科学方法呢？因为它不但集中地、生动地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而且集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地、生动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规律。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社会实践归根到底乃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一切真知的直接获得者。任何领导者的思想、意见、政策、计划、办法，其原料或半成品都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是形成正确思想的前提。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认识论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绝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因为任何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不但受到阶级立场、知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而且还受到实践的水平和范围的限制，所以个人的认识，难免带有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人民群众的认识，虽然也受到当时社会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认识才能汇成广阔的知识海洋，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成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正确的认识，就必须走群众路线，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向人民群众作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一致，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即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又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这也就是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这样两个飞跃。没有这两个能动的飞跃，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世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这两个飞跃的生动体现，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的具体运

用。

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一切智慧的直接来源。当然，群众也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个人的实践经验常常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之中，把这些分散的、无系统的但都是生动的和丰富的认识、经验收集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认识，形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① 要做到“从群众中来”，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这就是来自群众的原材料一要全面，二要真实。如果原材料只是一鳞半爪，不全面，或者是道听途说，不真实的，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不但把干部、农民，而且把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等等都当作自己的可敬爱的先生。他说：“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还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② 要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掌握既全面又真实的原材料，就应当采取毛泽东同志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倡导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毛泽东同志还经常强调：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包括反对自己意见的话，都要听。我们在深入群众实践的时候，既要听普通人的意见，又要听专家们的意见；既要听先进分子的意见，又要听中间状态、落后状态人们的意见；不仅要听好的，看好的，还要听不同的，反对的，看不好的、失败了的。总之，各种意见都听，各种情况都看，这样做就能最广泛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偏信”而不“兼听”，那就根本不是群众路线。

要做好“从群众中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善于把来自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这个“集中起来”并不是把来自群众的大量材料简单地相加，也不是对不同意见的折中和调和，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对大量的材料进行认真的思考，周密的分析，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形成系统的意见、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的过程，也就是经过思考的作用，由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只有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算完成了“从群众中来”，即“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的过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程。

毛泽东同志说："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就是说，不但要"从群众中来"，而且要"到群众中去"。把集中起来的意见，把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交给群众，变成群众的行动，并在实践中继续征求群众的意见，接受实践的检验，以便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丰富不完善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过程。

善于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使群众坚持下去，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因为集中群众的意见是为了指导群众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就需要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向群众作宣传解释，使之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只有在回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检验集中起来的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使原来集中起来的意见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群众路线就把"群众——领导——群众"与"实践——认识——实践"两个不同方面的辩证过程科学地统一起来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总是一个由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辩证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秩序也是一致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就是“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是“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①，这也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可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总之，由于群众路线体现了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的统一，领导智慧和群众智慧的统一，个别和一般的统一，因而它也就成了我们党的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成为我们党在一切活动中的根本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认识论、唯物史观同群众路线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这样普及、深入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三）坚持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的各种错误倾向

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它象一条红线一样，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贯串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之中，表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实践之中。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① 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又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革命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就胜利，就前进；什么时候背离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就遭挫折，受损失。

回顾一下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更加深切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人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正是由于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发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正是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开辟了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革命力量如鱼得水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正是由于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终于坚持抗战八年并夺得了最后胜利。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发动人民群众，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建立了最广泛的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相反，我们遭到的每一次挫折和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群众。陈独秀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暂时强大的敌人面前吓破了胆，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压制群众，脱离人民，招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王明同样是脱离群众，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几乎把革命引到了绝境。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对党的历史经验是这样总结的："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

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始终是同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也是这样。建国以后，我们党在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在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都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都是因为事情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的结果。相反，当着我们离开了群众路线、违背群众根本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听群众的呼声，违背群众利益，结果犯了错误，受到很大损失。“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果使党、国家和人民群众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群众路线确实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确实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确实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开它。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其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尤其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要坚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9页。

决反对阻碍实行群众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官僚主义，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既要反对个人崇拜，又要反对崇拜自发性等等。

官僚主义和群众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执行群众路线的最大障碍。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把个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眼睛里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官僚主义者夸大个人的作用，不懂得凡事要依靠群众，不懂得有事要同群众商量，更不懂得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以感想代替政策，迷信自己，独断专行，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意见，更不愿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不克服官僚主义，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势必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同志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

无政府主义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但绝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把发扬民主和加强领导结合起来，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和"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既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又是民主和集中的高度的统一。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既反对官僚主义，又反对无政府主义，才能真正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它妨碍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① 命令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把超越客观现实、超越群众觉悟的东西强加在群众头上，它是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的。命令主义者把自己看成是"英雄"，把群众当成愚昧无知的"群氓"，自以为个人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工作的失败。在领导工作中，命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左"的错误。

尾巴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它同样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② 尾巴主义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也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从主观来的，迎合落后分子的意识，脱离了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尾巴主义者不是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群众前进，而是跟在落后分子的后面，阻碍人民群众前进的步伐。这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背离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在领导工作中，尾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右的错误。

群众路线和个人崇拜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坚持走群众路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线就必须反对个人崇拜。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也承认革命领袖的重大作用，人民群众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但是决不能搞个人崇拜，决不能把领袖人物神化。盲目崇拜个人，把个人神化，就会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就会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否定群众路线。个人崇拜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坚持群众路线，不但要反对个人崇拜，而且要反对崇拜自发性。崇拜自发性，否定革命政党和革命领袖的作用，是同群众路线不相容的。因为失去了党的领导和革命领袖的组织、指挥，群众路线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列，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党的威信、领袖的威信，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崇拜自发性，否定党的领导和革命领袖的作用，反对一切权威是完全错误的，反对崇拜自发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总之，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个人崇拜和崇拜自发性等等，都是与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它们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领导和群众相脱离，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然给工作造成危害。要真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崇拜自发性等这些错误的倾向。

第三节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包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哲理。全面地理解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独立自主"是什么意思呢？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根据在于自身的矛盾，在革命和建设中要发挥独创精神，坚持自力更生，按照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办事。"独立自主"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独立自主"同"实事求是"一样，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和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学说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原理，是"独立自主"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

事物的运动是"自己运动"还是外力推动，历来存在着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斗争。列宁在总结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时，深刻地指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根据第一种运动观

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①第二种观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它肯定一切事物运动的动力、源泉在于事物的内部，都是“自己运动”。所谓自己运动，就是事物通过自身来发展自身的运动。列宁多次强调事物的“自己运动”是一个极深刻的、极重要的辩证法原理。毛泽东同志坚持了事物“自己运动”的学说，并且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及其相互关系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基本理论。他在《矛盾论》中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②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明确、深刻而全面的科学论述。

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学说，黑格尔早就说到了。不过，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把“自己运动”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己运动，而把自然界和社会一切事物的运动都看作是“绝对精神”自己运动的表现，这是本末颠倒了的世界观。但是，黑格尔的“自己运动”的学说确实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列宁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他指出：这里重要的是，“辩证法的特征：自己运动、活动的泉源、生命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和精神的运动”①。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概括辩证法的要素十六条，其中第③条就是：“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②

事物为什么能够自己运动？列宁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③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自己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于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④运动和发展就是事物自身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就是事物自身矛盾向着对立面的转化，就是新的方面否定旧的方面的过程。由于承认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唯物辩证法也就避免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是自己运动。

唯物辩证法坚持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事物可以脱离周围环境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与周围的事物互相联系着的。“自己运动”不等于孤立运动。毛泽东同志肯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他又着重指出每一事物又都有自己内部的特殊矛盾，构成自己的特殊本质，形成自己内部的必然的运动。

---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7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人类社会也是一个自己运动的过程。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这个社会自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生产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命题集中地、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学说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独立自主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肯定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无产阶级革命是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的，它本身是国际性的事业。但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本国人民群众的“自己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积极奋斗的结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过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困难、不断前进的历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面对着反动势力的封锁和多次“围剿”，革命的处境简直困难极了。但是，

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形成的“铜墙铁壁”继续战斗着。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多次反“围剿”的胜利，生动地证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国民党又对我们搞摩擦，实行重重封锁，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仍然生存下来，继续进行抗战，并且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坚持八年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依靠“自己运动”实现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 由于坚持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也学会了生产；我们的老百姓不仅会生产，也学会了打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我们克服了无数困难，赢得了革命和战争的一个一个的胜利。抗日战争取得胜

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8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917页。

利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反动势力气势汹汹，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生死搏斗。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 事实证明，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8年以后的三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0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外顶住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压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也上了天，同时还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这是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又一曲胜利凯歌。外国朋友也承认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创造的奇迹。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英勇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30页。

奋斗和辛勤劳动的结果。完全可以这样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无价之宝。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现代化依靠什么力量呢？可以肯定，如果不立足于国内，不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依靠我国人民群众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幻想和指望国外的什么神奇力量来解决问题，那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只能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国的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依靠本国的积累，挖掘内部的一切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每一个具体单位，每一个具体人来说，也应当这样。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如果自己不动手而主要依赖别的单位和别的人，事情就很难办，毛泽东同志说过："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

它。”①对于上面来说，要敢于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发挥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对于下面或者个人来说，则应当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自力更生，善于自力更生，这应当是我们在一切实践活动中的基本方法论。

（二）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从实际出发，尊重国情，分析具体矛盾的特点，按照事物自己运动的规律，找出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另一个基本点。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矛盾不是抽象而是具体地存在着，是通过千差万别的各自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的。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规定着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具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不仅要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提出不同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观点具体研究战争规律时，就指出不但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讲到战争规律的发展变化时，又强调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同志关于如何研究战争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完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全可以推广于研究各个领域，其基本原则就是把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下，具体地分析本国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把握本国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确定自己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按照事物本身的特点和自己运动的规律，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在坚持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内出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不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去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不能用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因而使中国革命事业走向碰壁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 就是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指导革命胜利的方针、政策，要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自己的实践中去解决。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路是要自己走的。毛泽东同志在同教条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矛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中国革命"自己运动"的正确道路，科学地制定了革命的纲领、路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5页。

线、战略、策略，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自己运动”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自己运动”的规律。走这条道路，就把中国革命引向了伟大的胜利，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决策，是又一个光辉范例。当时有不少同志对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估计不足，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持怀疑态度。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中日双方的特殊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战略作用。他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游击战和正规战相配合、建立根据地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规定了我军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我军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游击战方针指引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威武雄壮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广大地区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演出了一出出人民战争的史剧，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党和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而没有实现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得了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从中国农村

的特点出发，经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也曾多次强调不要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应当走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大力促进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经验。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中的很多问题认识不足，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因而我们也做了不少不适合中国特点、违反事物“自己运动”规律的事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损失，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只要做到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们的事业就必然胜利；相反，如果犯主观主义，脱离了国情，盲目地跟着别人走，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或者不顾客观实际而主观蛮干，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失败。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党已经逐步确定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我们的各项事业正在按照“自己运动”的规律，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每一领域的工作都已经解决了自己发展的具体形式和具体道路问题。每一领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都有自己特有的情况和特殊的规律性，都有一个继续努力创造适合具体情况，发展要求的形式和路子的问题。例如，在我们各地区的工作中，通常讲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质上就是一个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的问题，怎样做到既符合本地区的实际，又符合全局的需要；既发挥了本地区的优势，又促进了而不是妨碍了全局优势的发挥。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实际情况的真正发挥优势的路子来。总之，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只有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按照事物"自己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办事，独立自主地走适合自己情况的道路，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

（三）坚持独立自主，要求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有信心，有勇气，艰苦奋斗，不断努力，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又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他勉励我们既要象愚公那样，有操之必胜的信心，毫不动摇的决心，坚信自己的事业一定要胜利；又要象愚公那样，艰苦奋斗，实干苦干，"每天挖山不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自己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毛泽东同志经

常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来鼓舞我们的信心和激励我们的斗志。如果看不到前途，失去了信心，在敌人和困难面前变成了软骨头，那就根本谈不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看不到曲折和困难，盲目乐观，不肯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不一个个地去克服前进中的困难，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一句空话。

事物发展的趋势总是前进的。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发展中，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应当充满着必胜的信念，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应具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具有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排除万难、奋斗到底的勇气。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波浪起伏，呈现出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应当看到有的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有的因素则是暂时起作用的。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是由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它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而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些就是决定事物发展趋势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我们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树立前进的信心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志，坚定不移地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怎样的惊涛骇浪，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族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不但要象愚公那样充满信心，毫不动摇；而且要象愚公那样艰苦奋斗，“挖山不止”。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自力更生就一定要艰苦奋斗，丢掉了艰苦奋斗也就等于丧失了自力更生。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毛泽东同志说:“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① 曲折性意味着艰苦性，要知道困难和艰苦绝不会自行消失，这只能靠我们艰苦奋斗去克服。毛泽东同志说：“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② 我们正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困难，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7—1078页。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告诫全党：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中又一次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同志认为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并且指出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他还说过：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丢掉了艰苦奋斗，就会衰亡下去，这是真理。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有过不少失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毕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同我国人民长期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阐发的愚公移山精神，不仅从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中说明了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满怀信心，藐视困难，又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而且还生动地体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只要坚持下去，只要不断地努力，“毫不动摇”、“挖山不止”，量变就必然会引起质变，革命事业就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愚公移山精神的落脚点，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把

全国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据。

“大智若愚”，“愚公”不愚。毛泽东同志阐发的愚公移山精神，异常生动而又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这是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激励和鼓舞。尽管我们建国以来发生过几次失误，甚至发生过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尽管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又是非常艰巨的，但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科学总结，我们取得了丰富而又深刻的经验，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象愚公移山那样，坚定信心，提高勇气，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为了搬掉贫穷落后的大山，胜利实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四）坚持独立自主，要求按照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正确地处理主和辅的关系

独立自主绝不是排外，独立自主本身就包含了主和辅、内和外的辩证关系，包含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同周围的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着。唯物辩证法坚持用联系的观点

来看待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总和中研究事物的发展，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引起事物的“自己运动”的力量源泉，它决定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基本方向。一个事物有了内因，就有了必然性，按自己的必然规律发生和发展，又按自己的必然规律灭亡。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又总是离不开同其他事物的联系这个外部条件，就象生物本身不能脱离周围的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离开外部条件，事物的内因也不可能孤立地发生作用。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根据和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起作用的。但是不能把根据和条件的地位等同起来，外因的作用不管有多大，它毕竟只是一种条件。无论怎样也不能直接决定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性，它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外因不通过内因，事物的内部矛盾不接受影响，外因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如果事物内部不存在特定的内因，那么，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外因作用于事物，也不能使事物发生某种特定的质变。因为内因是根据，所以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应当承认，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外因对于事物的发展有极其巨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危重的病人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医疗上的抢救对于患者的生死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在医学上是肯定了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因之所以发生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适应了事物内部的要求和需要，符合于内部矛盾所决定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否则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作用。

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是我们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独立自主和国际援助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先进事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国无论大小，也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得自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毛泽东同志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①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动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生产和消费的这种世界性的相互促进作用。我们还应当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落后，但又不甘心落后。党和毛泽东同志毫不含糊地肯定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都比较落后，这就表明我们要认真地向外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在这点上我们要反对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和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虚心向外国学习，关起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门来，闭目塞听，不求进取，拒绝利用外援和引进外国的新技术，这就如同作茧自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学习外国、接受外援是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才干，提高自力更生的实力。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卑躬屈膝，一切崇洋媚外、甚至不要国格、人格的现象，都是极端可耻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经批评有些人就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有这种贾桂精神状态的人，既谈不上坚持独立自主，也谈不上真正地学习外国的有利于我们的先进经验。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必须是有分析地批判地学，要采取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提倡的态度，要拿来的是外国的长处和优点，而不是别人的短处和缺点。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我们就要坚决地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些腐朽的东西，特别是自由化的那一套，肯定会利用我们的开放政策乘虚而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它进行严肃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①。我们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长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我们学习和研究外国现代化的经验，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点上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一切照抄和机械搬用。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和创造，使外国的东西中国化，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来，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关系的论述，生动地体现了内因和外因关系的辩证法，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是我们在一切实践活动中必须永远坚持的。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共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共同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如何科学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则，我们的事情就做不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会失败。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我们说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求真理，就是指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求是"，人民群众既是力量的源泉，又是认识的源泉，只有从

①《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使我们得到正确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同志把党的群众路线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是一致的。独立自主的立足点，就是实事求是，即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的关系中，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没有实事求是，搞主观主义，就根本不会有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运用，又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没有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既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也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这就是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群众路线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独立自主则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为基础。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那就既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实际，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如果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不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一句话，不坚持独立自主，那就既丢掉了实事求是，也丢掉了群众路线。由此可见，这三个基本方面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独立自主，具有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是长期起作用的，无论哪个领城、哪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永远坚持它。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真正做到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问题。毫无疑问，能否坚持这样做，这是关系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

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一贯坚持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存事物进行革命的改造，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证明，"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中国转化为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实践的唯物主义在中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个中国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展开，用于解决政治、军事、思想和经济等实际问题，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唯物史观，从而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体现了思维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统一。这就是说，离开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展开，是对历史过程的内部、本质联系在辩证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当然，它不是对历史过程的直观反映，而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我们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实践经验作了思维的抽象反映。它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所以，它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中，在各个领域里都闪耀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展开，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辩证法、党的建设的辩证法、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篇章。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 党的政治路线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正确与否，从根本上说，在于它是否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发展的规律。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转变，一次是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的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两次失败，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造成的，而两次兴起，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提出和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独创性地解决了我国民主革命中的一系列新问题，开创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法。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首先强调要研究并弄清中国的国情，把中国革命的问题放在中国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认识和解决，使中国革命理论牢牢地建立在符合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各种矛盾出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为我们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同志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在革命实践中，他详尽地分析了自帝国主义侵入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中抓住主要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①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析，确定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首先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革命才能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离开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些人认为，中国要经过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才能进行革命，这是一种右倾的观点；还有人认为，中国革命不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种"左"倾的观点。这两种错误观点都是对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594页。

和社会性质作了主观主义估计的结果。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因此，只有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才能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在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上、政治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解决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首先，毛泽东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客观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确定我们的斗争策略。他说："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① 那种脱离实际，从"本本"出发制定斗争战略和策略是没有不失败的。只有洗刷唯心精神，通过实际调查得到的正确的阶级估量，才是我们党制定斗争战略和策略的客观基础。其次，毛泽东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政治态度，从而正确地分辨了革命的敌、友、我。他说：中国现时社会的所有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这就是说，经济决定政治，各阶级在政治上的对立和斗争，是由它们在经济中的对立和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4—25页。

斗争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毛泽东同志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正是依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引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即特殊国情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之间相符合，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生动体现。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侧面，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分析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及其关系。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正确地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①就是说，用革命暴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打碎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的国家政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共性。它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普遍真理。但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环境下进行的，由于中国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决定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也就不同，有其特殊规律，这是个性。共性和个性是互相联结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是共性的部分、颗粒，但任何个性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共性之中。因此，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这是共性，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的具体道路，这是个性。只有把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着重研究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他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中国的特殊表现，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此外，中心城市被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反动派长期统治着，其势力比较集中和强大。广大而落后的乡村则是反动统治势力较薄弱的地区，等等。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

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迴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①这里，毛泽东同志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在帝国主义时代一般矛盾中所表现的特殊性，又分析了这种特殊矛盾中包含着的普遍性；既分析了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发展起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又分析了这种特殊性中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原理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运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普遍原则，根据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引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道路。他说：斯大林讲的"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又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的论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所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一开始，就面临着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艰巨任务。又因为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工人阶级占少数；而强大的敌人又总是占据着中心城市。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开展农民游击战争，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才能逐步取得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分析，进一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使这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战胜强大的敌人。在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长期在广大的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①，夺得全国政权的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内容之一。它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特殊规律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

（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都是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1317页。

首先，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原理，阐述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他说："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整个过程所要解决的是两个不同质的矛盾：一个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一个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个矛盾虽然同时存在，但矛盾的激化情形却不同，有先有后，不能同时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就分成两个不同性质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②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指明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小阶段。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有其特殊矛盾，构成一定阶段上质的稳定性。只有解决前一阶段的特殊矛盾，才能前进到下一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善于认识和抓住发展阶段上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矛盾特殊性，制定解决每一阶段特殊矛盾的斗争策略，引导革命由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

其次，毛泽东同志运用量变质变的原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不间断性。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① 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也是采取由相对静止状态转化为显著变动状态，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达到矛盾的解决。如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解决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过程就由民主主义阶段转化为社会主义阶段。不同革命阶段的转变，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经过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中的两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相互衔接、不间断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② 中国革命由现在阶段推移到将来阶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定社会过程中的矛盾运动没有完结，社会革命运动也就不会完结。客观矛盾运动的连续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性，决定着革命运动的不间断性。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不断革命论，在完成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在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不间断性后，进一步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比喻为文章的上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过程的有机构成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统一起来的。一方面，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制度来说，二者是根本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质的规定性，我们不应当把不同质的革命发展阶段混淆起来，应当把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同现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区别开来；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二者又是互相衔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的。它们的联结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我们不应当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们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通过脚踏实地地实行党的最低纲领，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过程中，就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可见，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是以不断革命论为指导的，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不断革命的体现。对现阶段而言，各个阶段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即有质的规定性，只有解决现阶段的特殊矛盾，才能进到下一阶段；对前后阶段而言，现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既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结果，又是后一阶段发展的准备，我们要以不断革命思想为指导，立足于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努力工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完成任务来实现不断革命。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中国革命运动的阶段性和不间断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上既反对不承认革命发展阶段性的“左”倾错误，又反对把革命发展阶段凝固化的右倾错误。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① 他批评有一些人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不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道革命有阶段之分，指出这种观点是混淆革命步骤的“左”倾空谈主义。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事物总是发展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这是谁都不能推翻的定律。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他批评有些人看不到革命是由若干阶段构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往往把革命停留在某一阶段上，割裂了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指出这种观点是把革命阶段凝固化的右倾保守主义。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衔接起来的不断革命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把革命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发展到另一个胜利。

（四）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普遍规律。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革命发展的道路不同，因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也就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只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

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① 由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同苏联的政权形式相比，在阶级结构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压迫对象上，也就有我国的鲜明特点。列宁曾经设想过，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也设想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实现列宁的设想。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实现了列宁的设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全国解放以后，党根据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采取了一整套由低到高的改造步骤，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使它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又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选举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② 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压迫对象，而是人民的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97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0页。

部分。无产阶级是通过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政治同盟的这种形式，逐步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和改造，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而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逐步归于消灭。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创造。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和在具体形式上的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阐明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个方面的区别和联结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他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①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和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一样，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民主只给人民而不给敌人；专政只能对付敌人而绝不能对付人民。民主和专政既是矛盾着的两个对立的侧面；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两个侧面。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①。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敌人实行专政，必须依靠群众。没有人民民主，就不能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同样，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镇压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没有对敌人的有力专政，人民就享受不到广泛的民主。民主靠对敌人的专政来保障，专政靠对人民的民主来实现，二者是相反又相成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一概括本身，不仅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科学地表达了我国政权的性质、任务和职能；而且在表述上直接体现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是对我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的哲学概括和理论升华。

毛泽东同志指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反对割裂民主和专政辩证统一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反对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纪律绝对对立起来的右的错误倾向。他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②西方的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是根本区别的。如果有人利用"民主"进行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2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0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不许可的。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滥用专政工具，破坏民主和专政辩证关系的“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① 专政的作用，就是解决敌我矛盾。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绝不允许把对敌人的专政用来对付人民。如果把人民民主专政只归结为“镇压之权”，否认人民民主，甚至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那就会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就有可能重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只有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符合民主和专政既相反又相成的客观辩证法，才能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认识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总结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7页。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毛泽东同志运用主要矛盾的原理，分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社会矛盾，全力找出和把握了我国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为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革命转变的客观形势，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做了科学的概括。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② 1952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重申：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3页。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矛盾是事物所固有的，主要矛盾是由事物发展的客观情况和条件所决定的，并随着情况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也是由我国社会发展状况、革命条件和任务的变化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经济等条件的不同以及革命性质、任务的区别，指出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任务已经完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这个任务正在进行。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研究和认识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特点。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不仅同时并存，而且相互斗争。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① 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是同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两面性，但从根本上说，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必然是一种行将被消灭的经济；以生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3页。

产资料个体劳动者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经济，是分散的不稳定的经济，也不能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多种经济成分的状况表明，由于过渡时期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因而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其次，表现在政治上，是与五种经济成分相联系，在政治上主要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并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掌握国家政权。由于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特定的阶级结构，因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工人阶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定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同志根据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制定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总路线。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7页。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定历史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为此，就要消灭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改变生产关系，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因此，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中心工作。

主要矛盾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关键，可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迷失了方向。总路线和各项工作的关系，就是纲和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我们坚持总路线，就抓住了纲，抓住了关键，就能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推动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发展；离开了总路线，就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各项工作就要受到挫折，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我国过渡时期的实践经验证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要矛盾，从而制定正确的总路线是极端重要的。由于我们党紧紧抓住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采取了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以及改造个体经济等一系列措施和步骤，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因而使我们国家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

变，到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仅分析和概括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还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和条件，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了主要矛盾的转化。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做了正确的论述。"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们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初，他又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分析，反映了我国历

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辩证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了，作为剥削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不存在了，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劳动群众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可是，当时的生产力还很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难以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很快地加以改变，社会的物质财富不能有更多地增加，人民的生活也就不能改善，在一定意义上说，势必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列宁说："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① 毛泽东同志也说：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因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

但在那时，还不能说我们党已经掌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八大"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转化的

①《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

正确思想，由于后来对主要矛盾的认识脱离了实际，发生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而没能始终一贯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贯彻执行，党的工作重心也长期没有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和平赎买的独创形式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具体地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特点，独创性地提出和实行了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特殊形式，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

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或在革命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的革命性，是革命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异常软弱的，因而又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此，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着长期的统一战线关系，全国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参加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制定并遵守《共同纲领》。以后，他们又表示拥护我国的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同时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两重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又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盲目发展，投机破坏，必然侵蚀社会主义经济阵地。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是掌握全国政权的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具有两面性，因而决定了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性和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特殊方式。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又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

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① 我们党正是依据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这种特殊性，创造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独特形式。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论述，是运用和发展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生动体现。

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决定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是现实性，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需要有许多条件，既要有客观条件，又要有主观条件。没有必要的条件，和平改造是不能成功的。那么，在我国具备哪些条件呢？刘少奇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权和工农的巩固联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国内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就是我国所以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②。在政治上，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保证。工人阶级完全有力量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有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完成消灭阶级和消灭剥削而斗争，这就使得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反对工人阶级是没有出路的。在经济上，我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9页。

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

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了原材料和商品货源，控制了市场，使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材料、商品的供应、市场销售和商品运输等方面不依附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就难以生存下去。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社会主义占领了农村阵地，国家控制了资本家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卡住了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自由购销的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工农联盟的加强，使资产阶级陷于孤立，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也是实现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当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进一步切断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国际资本的联系，打破了它们对帝国主义所寄于的幻想。除上述的客观条件外，我们党制定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对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① 可见，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发展上述种种条件，才能把可能性变成现实。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9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几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段，由低到高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实现对其和平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是灵活了。”这就是说，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多种过渡形式逐步完成的。所谓“多种”，就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所谓“逐步”，就是要循序前进、由低到高、由量变到质变，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正是依据这些原则，我们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我国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不同程度上的联系、结合和对立，体现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两种经济成分的对立统一，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因素，是推动社会主义成分逐步发展，最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私有制改造的内在根据。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它是社会主

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的外部联系，是两种经济成分在流通过程中的联系。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企业的所有权仍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质未改变，但已经有了部分的质变。它使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间接地纳入了国家计划，并在工人监督下，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两种经济成分在企业的外部联系，既有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作用，又有居于优势和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作用，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了某些变化。公私合营，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合营的方式，在企业内部建立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生产资料为公私共有制。在公私合营两个矛盾方面中，以公方为主要方面，在公方代表主持下，生产经营直接纳入国家计划，为国计民生服务。企业的财产支配权、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中。利润的分配，资本家只能取得四分之一左右。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私营企业发生了较多的质变，是一种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它与公私合营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不是公私共有制。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国家按私股份额付给一定的利息（定息），企业的全部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使用，资本家失去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企业管理权和利润分配权。因此，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上述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方面是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逐渐增长，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逐渐削弱，社会主义经济由企业外部进入内部，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最后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由低到高，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它反映了各个不同阶段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体现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采取这些循序前进、和平过渡的形式，使人们的思想和工作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调动了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有利于对企业、对个人的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巧妙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赎买是对工人阶级“最便宜不过”的科学论断。

社会主义就是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① 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有它的经济基础，又有它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改造剥削阶级的所有制，而且要改造剥削阶级分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观念形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正确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在改造企业过程中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对资产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

阶级分子的改造，就是使其在经济上脱离剥削者的地位，在政治上改变他们的立场，改变他们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①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改造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制度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两方面的任务。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包括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改造，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是结合进行的。周恩来同志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②。陈云同志也指出：“既要改造企业，又要改造资本家，使他们从依靠剥削为生变成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这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③

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是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对企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转引自《新华月报》，1954年第10期。

③《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267页。

改造是对人的改造的经济基础、客观前提。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人的意识的变化，而人的改造又反过来促进对企业的改造。如果不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能有效地改造资产阶级，而如果不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进行改造，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也就难以顺利实现。我们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不是把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排除在外，而是把他们置于这场变革之中，使他们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这样，就可以在所有制改造的进程中，减少阻力，使资本家由反对走向不反对以至接受改造，促进企业改造的顺利进行。

我们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是要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目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在改造企业中改造资本家，通过消化剥削者来消灭阶级，这个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思想，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闪烁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丰富和发展了革命的辩证法，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武器。

（三）个体生产者的特点和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合作化形式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的辩证

的观点分析了我国个体小生产者的特点，论述了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同志认为，个体小生产者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他说，中国的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①又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②个体农民作为劳动者，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无产阶级是一致的，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他们又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指出：“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卖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③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就深刻地分析了个体农民的两重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种生产积极性。决议指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封建地主的土地制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方面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5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858页。

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①

毛泽东同志根据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的两种积极性，提出了实行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战略思想。他指出，土改后的广大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比以前有了改善，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土地不足，抗灾能力单薄，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到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土地改革以后，趁热打铁，立即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不仅充分肯定了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分析了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他针对农村土改后的情况指出：“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②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农民摆脱贫困，走富裕的道路。

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中，劳动者方面是基

①转引自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三联书店，下册第1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13页。

本的和主要的方面。由这种两重性决定的农民两种生产积极性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是主要的本质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始终高度重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① 他反复教育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必须相信广大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须从本质上发现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不仅对搞好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我们进行各项事业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论述了改造个体经济的方针、原则。一方面坚持"组织起来"，引导个体小生产者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说服教育的基本方法。这就把组织起来和自愿互利辩证地统一起来，生动地体现了对小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我国的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改变农民的私有制，实现集体化，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改造小农经济，决不是用简单的一声号召所能实现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07页。

的，更不能用强迫命令或剥夺的手段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只能坚持自愿互利原则，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渐进到飞跃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根据小生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一贯强调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发展农业合作社，要“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引导农民群众——在开始是一部分，随着将是大部分，而最后将是全部——跟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①我国创造的“逐步过渡”的形式，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些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逐步过渡的形式，体现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体现了农业合作化中的辩证法。采取这种逐步过渡、逐步前进的办法，可以使农民随着经济基础、经济地位的变化逐步地改变私有观念，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比较从容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些步骤和过渡性的经济形式是恰当的，行之有效的。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做出的重要的新创造。

改造个体经济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制度的革命，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的革命。它不仅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而且要改变私有观念和一切旧的生活习惯。党和毛泽东同志

①转引自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三联书店，下册第18页。

坚持经济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辩证法，十分重视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强调教育农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又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的变化结合在一起的，实现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只有首先变革思想才能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只有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但社会意识不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立即变化，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不仅要重视人的思想意识在建立经济制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还要重视和加强它在巩固经济制度中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了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巩固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

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化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①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始终贯彻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断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通过改革逐步得到解决。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四）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同志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5页。

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从它产生起就开始了它自己的矛盾运动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运动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列宁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多次谈到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工人与农民之间，在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灭了，矛盾还会存在。”①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他们只能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某些预测，不可能详细地论证。列宁虽然经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有一定的经验，但由于他逝世过早，没能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情形，也不可能系统地充分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斯大林长期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大量的内部矛盾，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有过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但他在一个长时期内，看不清也没能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更多的强调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否认矛盾是社

---

①《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他逝世前夕，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观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问题。特别是阐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精辟地论述。他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除此以外，在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思想矛盾，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思想解放与思想僵化的矛盾，实事求是与主观武断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具有不同特点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

针、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性质、根源和处理方法的论述，构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根据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的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出发，明确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①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应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即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应采取非对抗的形式，即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对立统一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团结和斗争既是互相排斥的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团结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人民内部只有首先分清是非，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一致。而要分清是非，就要对人民内部的种种错误的思想行为开展批评，或者进行必要的斗争。这种分清是非的批评和斗争，对革命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毛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9页。

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① 这就是说，只有对人民内部的错误东西进行批评或者斗争，分清了是非，才能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但批评和斗争决不能脱离团结，它必须受团结的制约。批评和斗争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要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把揭发错误，批评缺点比作如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因此，在进行批评和斗争时，要时时想到维护和加强而不是削弱和破坏革命团结这个目的。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法，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斗争，否认团结，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另一种是只讲团结，否认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的"团结"。这两种错误倾向从不同的两个极端割裂和歪曲了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0页。

主题。他指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新的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① 这个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深刻发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源。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一定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社会表现为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同的主要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的直接动力，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前进、如何前进的关键，就成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的政治任务，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毛泽东同志说：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严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9页。

格区分和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坚持群众路线，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五）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无产阶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必须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验。但是，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各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大农业国，农业发展的状况对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是基础，这是普遍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如果不突出抓农业，不解决粮食问题，那就不但没有国家的工业化，而且也无法进行其他一切事业。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陈云同志也指出："农业问题，市场

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①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业，就是动员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燃料、电力、运输工具等各种重工业产品以及各种轻工业产品提出巨大无比的要求；就是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大军发展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发展棉花和许多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就是动员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的工业建设和其他事业积累大量的资金。可见，大力发展农业，必将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改善全国人民生活和巩固工农联盟。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②毛泽东同志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同时借鉴了别国的经验，正确地阐明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要用多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

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17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62页。

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陈云同志也指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根据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① 毛泽东同志根据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原理，还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即首先从加强农业、搞好农业着眼，把农业放在首位，把安排好农业作为出发点，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然后根据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农业提供商品粮、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可能，安排轻工业的发展计划，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提供的可能条件，来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是解决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矛盾，根据我国国情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正确道路。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重要的作用。

（六）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

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42页。

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矛盾，阐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并提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种种矛盾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国防不可不有，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为了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国防建设。但是，国防建设也有赖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①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少数民族帮助了汉族，汉族也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关于内地和沿海工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发展内地工业可以改变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的工业布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61页。

局，它有利于工业生产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市场，有利于促进工业和农业的接近，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备战和巩固国防。因此，“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又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中央和地方体现着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全局高于局部，全局统帅局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和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必须执行国家统一制定的方针政策，服从统一的经济计划，遵守统一的纪律。但是，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所构成的，必须把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关于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①。一个社会主义国

①转引自周恩来总理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家，首先必须立足于本国，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潜力，才能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都要学。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只有学习外国，才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同志还运用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正确地论述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党把发展重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加强国防建设作为重点，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没有重点，就没有一般，这就是辩证法。怎么抓重点呢？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辩证法，提出从加强非重点入手来抓重点，拒绝单纯就重点抓重点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例如，关于发展内地工业，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关于原子弹，毛泽东同志指出：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毛泽东同志这些生动具体的论述，清晰地说明了重点和非重点不但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而且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这就是说，要想解决重点问题，必须从它的对立面上使劲，注意解决非重点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分析以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对立统一学说在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地运用和深刻地发挥，也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极宝

贵的探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这三方面的辩证关系。

国家和集体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统一整体，各个部门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要求国家对生产单位实行统一的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各个生产单位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规定的各项计划任务，保证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是，统一性和独立性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各个生产单位也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应当在国家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这样有利于调动生产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正确处理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既要反对只要统一性，不要独立性，统得太多，框得太死；也要反对只要独立

性，不要统一性，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只有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才能促进国家和集体经济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

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是根本上一致的。国家、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又进一步激发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用于进行建设的积累基金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基金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数量是一定的，用于国家建设的积累基金多了，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基金就要减少；反之亦然。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坚持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方针。他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①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只有增加国家积累，扩大生产建设，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必须教育群众顾全国家大局，坚决执行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43页。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努力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资金，用于加快国家建设。毛泽东同志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①但是，重视国家建设，不能忽视人民生活，讲积累，也不能忽视消费。陈云同志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②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国家和工人的关系时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他在讲到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时指出："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③这就是说，处理国家和个人的矛盾，一方面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搞好生产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那种只强调基本建设而忽视人民生活或者只强调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而忽视国家积累的做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都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61页。

②《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21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43—344页。

第三节 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和缔造者之一。在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他指挥的重大战役最多，从事军事实践的时间最长，指挥战争的经验也最丰富，论述的军事理论也最为完整、系统，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活动，总结了我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中外军事思想史中的合理因素，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对战争和政治、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兵民是胜利之本等一系列军事理论中的哲学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把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闪烁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宝库。

（一）战争和政治

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战争的产生、战争的性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对待战争

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思想。

什么是战争？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 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战争是阶级对抗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用暴力形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帝国主义和它的军事理论家、哲学家们却掩盖战争的阶级实质，把战争说成是神的鞭挞、神的报复，胜败决定于神的意志；战争是"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的"竞争"；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剩"引起的，甚至把战争说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然的永恒的现象"，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制造理论依据。

毛泽东同志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思想，阐明了任何战争都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马克思指出：危机的军事原因一部分是与政治原因相联系的②。列宁也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③ 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反革命战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决定战争，战争从属于政治。比如，我国的抗日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3卷，第234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2页。

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政治目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①这就是说，战争与政治又有区别，有其特殊性。战争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各国家、各阶级和各政治集团之间彼此为着自己的政治统治，长期地斗争着。当矛盾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一定阶段，采取其它斗争形式再也不能使政治发展下去的时候，就爆发了战争，用战争这种特殊手段来扫除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例如，旧中国的半独立的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障碍，日本就以侵略战争扫除之。就中国而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独立的严重障碍，因而就发动全民族抗战，驱逐日本侵略者，以扫除这个严重障碍。障碍已除，政治目的达到，战争就结束了。如果障碍没有扫除，政治目的没有达到，战争仍须继续进行。我们只有把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来研究，看到战争这一事物的个性即特殊性，才能认清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政治决定战争的同时，还着重指明战争对于政治的反作用。他说："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①毛泽东同志还说过，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威力之大，可以改造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毛泽东同志阐明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性质不同又决定着人心的向背。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凡是非正义战争，其目的或是镇压本国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或是强占别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反对，这类战争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革命的战争。相反，凡是正义的战争，其目的或是保卫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或是把人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或是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类战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进步的革命的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是始终起作用的，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正义和非正义、得道和失道、多助和寡助是战争性质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高度赞扬了正义战争、革命战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

---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①

毛泽东同志运用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的原理，论述了战争的性质不同，决定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支持一切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战争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于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的界限。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因此，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既不要简单地反对一切战争，也不要简单地支持一切战争，而是正确地分析战争的性质，拥护和支持一切正义的战争，坚决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这是我们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必须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

（二）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战争这个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在错综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唯物辩证法认为，战争也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是一种物质的运动，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只不过是战争比任何其他社会现象有更大的流动性，较难认识和驾驭罢了。

过去，有不少军事指挥者，认为战争根本无规律可循，只能由偶然的因素或主观的意志来决定战争的命运。如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就说过，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料上帝是怎样安排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提出认识和研究战争规律的任务，并著有《战争论》一书，但他也未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成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哲学观点考察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深刻地阐述了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列宁、斯大林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为指导，揭示了俄国革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规律，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 但战争和其它事物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战争双方都是武装着的活人，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都是为着消灭对方、保存自己，因而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不确实性。同时，由于战争常常受到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影响，战争双方都要求对敌方保密，再加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第166页。

上人为地制造各种假象，互相欺骗，因而一时难以捉摸。战争的这些特点，并非说明战争是不可认识的神物，我们反对战争规律的不可知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① 只要我们采取侦察手段，敌情是可以被了解的。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规律问题上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者。

如何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特别重要的就是从战争实践和认识中把握战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主观主义指导革命战争造成严重错误时，深刻地指出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但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中外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脱离革命实践，没有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我们要认识和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得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我们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就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地侦察敌情，既要摸熟自己部队的脾气，又要摸熟敌人的脾气，只有占有大量的丰富的材料，经过分析和研究，才能透过战争的现象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这是初出茅庐，纸上谈兵的人做不到的。毛泽东同志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这就阐明了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

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如同认识其他事物一样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认识战争这一事物，具体地阐述了战争领域中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指出：指挥员对于某一战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材料，进行思考，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第二阶段是把计划付诸实行，在实践中检验认识，修正和发展计划。

指挥员对战争的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②

指挥员对战争的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是从理性认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第164页。

回到实践，指导战争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①这说明只有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才能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实行对于战争的正确指导。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提出的指挥员对战争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认识战争过程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首创。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在尊重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的主观认识依赖于战争的客观实际，但人们的主观认识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自觉的能动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性，但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要靠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处于敌强我弱总的形势下，要想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充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能实现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在战争中，人特别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①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在战争中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勇敢的精神；二是由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指导战争的能力；三是人们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这三者在战争的不同范围内发挥作用，构成战争中的全部的主观因素。因此，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这就是说，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主观的努力对于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中，指挥员指挥得当，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就能使劣势变为优势，被动变为主动，可能变成现实。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第4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页。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把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打胜仗的关键。它告诉我们，战争的客观决定人们的主观，人们的主观正确地反映战争的客观，这是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人们对战争的客观规律反映得越准确，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就越充分；而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能正确地揭示战争的客观规律性，把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又是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如果主观思想不符合客观规律，那就必然打败仗。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人办一切事情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军事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我们坚持战争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就是要把客观物质条件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一方面必须批判那种片面夸大客观的物质条件的作用，无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批判那种忽视或否认客观的物质条件，无限夸大主观指导能力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同志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这里用舞台和演员这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66页。

样形象化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活生生地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指导，总是坚持实事求是，既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主观和客观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朱德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用兵方法。我们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实际情况为例。当时的红军十分弱小，白军十分强大，敌我力量悬殊。但是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拘一格，亲自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前三次的"围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四万红军对付十万白军，敌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法，我采取诱敌深入，中间突破，打其主力的战法，五天内打了两仗，顺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第二次反"围剿"，三万红军对付二十万白军，敌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法，我采取集中兵力，选弱者打，各个击破的战法，十五天打了五仗，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第三次反"围剿"，三万红军对付三十万白军，敌采取猛进长追的战法，我采取避其主力，打击虚弱，乘胜追击的战法，用三个月的时间，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四万红军对付五十万白军，这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同志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红军指战员仍然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战法，用三个星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相反，第五次反"围剿"，由于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不顾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主观臆断出发，采取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法，用了一年时间，不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反而被敌所制，致使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五次反"围剿"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思想符合客观规律，才能打胜仗。相反，如果采取主观主义的指导方法，必然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其结果只能打败仗。

（三）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运用于研究战争和战争规律，科学地提出了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因为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研究战争就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是有共同规律的，对一般的战争规律是应当研究的，因为一般的战争规律，表明千差万别的具体战争之间相互联系的共性，指明了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人们从事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任何特殊的战争都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如果一个具体的战争，离开了一般规律的指导，将会变成没有方向的盲目的行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应该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

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①这就说明，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只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因为一般的战争规律是通过特殊的战争规律表现的。如果不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就无法解决具体的战争中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研究战争这一事物时，必须从研究特殊的战争开始，上升到对一般的战争规律的认识，然后以对一般的战争规律的认识为指导，深入认识和研究尚未被认识或未被深入认识的更加特殊的战争规律。这个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辩证方法在军事学说中的运用。

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阶级力量对比等条件的不同，与其它国家的革命战争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又经过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受到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锻炼和影响；（二）敌人强大；（三）红军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分析和研究这些特点及其相互影响、作用和联结，是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这一具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体矛盾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处置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这些规律和特点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忽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性的错误，教导全党同志要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尤其是研究革命战争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要具体地把握时间、地域、性质这三个环节。注意从时间上把握战争的特殊性，就是着眼于矛盾的特点和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战争和战争规律都是发展的，不同时间的战争及其特点也是不相同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由于战争在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把一定时间的战争特点、规律呆板地移用于各个历史阶段。注意从地域上把握战争的特殊性，就是要注意战争在空间的特殊性。同是战争，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注意从战争性质上把握战争的特殊性，如革命战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和反革命战争，由于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相互移用。从时间、地域、性质三个方面研究战争的规律、特点，既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又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古今中外一般战争规律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科学地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争指导路线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战争这一事物的内部不仅包含着特殊规律，而且包含着一般规律，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随着战争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此时此地为特殊的规律，到了彼时彼地则变为一般的规律，反之亦然。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一般战争规律相比较，它是特殊的，是产生于中国这个特殊国度之中的。然而，它对于整个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来说，又具有普遍性（共性），因而又是一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战争时，正是以一般规律为指导，来分析特殊规律，又从特殊规律来把握一般规律的。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是“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而这个根本规律又是通过内战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进攻与防御的长期反复这个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如果不具体揭示长期反复这个特殊性，就不能指导红军打胜仗。然而，“围剿”与反“围剿”、进攻与防御长期反复这个具体的特殊性，对于各次“围剿”与

反"围剿"来说，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尽管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因战争的发展变化而相互转化，但我们在认识和指导战争问题上，要始终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以一般为指导，实现一般和特殊相结合，才能打胜仗。

（四）战争的全局和局部

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指挥员要有战略的头脑，掌握战略全局，正确处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这是多打胜仗的关键。什么是战争的全局呢？毛泽东同志说：这要看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范围，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同志通过对战略和战役战术关系的研究，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局部是隶属于全局的，全局统帅局部，决定局部；而局部必须适应全局，服从全局。因此，不仅战略指挥员要研究战略全局问题，而且战役战术指挥员也要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全局问题。战略和战术指挥员只有了解了战略意图，才能深刻地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自觉地使战役战术服从战略要求，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对一个指挥员来说，能不能正确地处理战争全局性的问题是决定战争胜败

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①战争的指导，要求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胸怀全局，在作战指挥上不但要考虑到左邻右舍，而且要考虑到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情况及其对全局的影响。切忌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有时候，在局部看来是不可行的，但是在全局看来却是必要的，这时候就要照顾全局，不惜牺牲局部来换取全局的胜利。有时候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但在全局看来是不可行的，这时候就必须"见利不趋"，不能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战争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局部的胜利，对全局反而有害，有时局部的失败却挽救了全局。所以，我们一定要胸怀全局，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从整体上把握住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自如地驾驭战争，多打胜仗。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组成的，全局是不能离开局部的；没有局部，也就没有全局。因此，指导全局的人必须关心局部，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做到全局在胸，又照顾局部，特别是照顾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性的局部。由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事物的各个局部所处的地位也就不同。有的局部是重要的，是全局的中心环节，对全局起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局部则是次要的，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战争这一事物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说："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① 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是带全局性的问题。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聪明的指挥员就在于他胸有一盘棋，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争取战略的主动，而不以枝枝节节的一时一役的成败定输赢。同时，聪明的指挥员还特别注意把握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环节，善于抓主要矛盾，紧紧抓住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局部。

战争的全局和局部不仅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全局和局部的划分是相对的，是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性的东西，在另一定场合则变为局部性的东西；反之，在一定场合为局部性的东西，在另一定场合则变为全局性的东西。比如，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对全国而言，这三大战役都是构成解放战争全局的局部，对三大战役本身而言，每一个战役都是一个全局，而构成战役全局的各个战斗、各项具体工作则是局部。全局和局部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不能凝固地静止地看待和处理战争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树立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辩证关系的光辉榜样。无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是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指挥全国军民与敌人战斗，夺取了一个又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第160页。

个的伟大胜利。比如，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平津战役，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他把就地全歼华北之敌作为战争全局的根本方针。在战略部署上首先完成对天津、塘沽、芦台、唐山等诸点敌人的包围，然后各个歼敌。战略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①。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逃，他指示我军在淮海战役中消灭黄维兵团之后，对杜聿明兵团之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还指示华北部队缓攻太原，撤围归绥，对保定的敌人采取监视行动，不要歼灭；同时还指示山东方面我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防止平津之敌向青岛逃跑。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只用了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三个兵团，正规军五十个师，非正规军四个师共五十二万余人，攻克了张家口、天津等城市，和平解放了北平。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正确处理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尤其是关照全局对于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性。指挥战争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就是说，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作战部队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问题，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的。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是战争指挥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战略和策略、藐视和重视的对立统一，是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生动体现。在人民革命斗争中，都有一个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敢不敢革命、敢不敢夺取胜利和怎样革命、怎样夺取胜利的问题。这里，就发生了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过程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关系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因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人们便提出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和怎么办的问题。在革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以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思想为指导，组织和领导了湖南、江西一带数县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红军弱小，敌人强大，因而根据地经常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呢？这是人们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有些人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了当时

国内的政治形势，正确地估量了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伟大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进一步作了科学的表述：“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 随着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同志把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作为克敌制胜的指导原则加以丰富和发挥。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进一步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把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② 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本质上都是虚弱的，落后的，腐朽的，它们必然走向灭亡。而暂时弱小的革命势力却代表着新生力量，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真理在人民手里，是不可战胜的。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从本质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91页。

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从这点上来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还有很强大的力量，是会吃人的，而且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民革命事业还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会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从这点上来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我们每一个从事革命战争的同志必须在战略上、在总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它作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如果在战略上把敌人看成是真老虎，革命就无从谈起，夺取胜利也是一纸空文，那就会犯右倾错误。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又要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和消灭敌人。如果在战役战术上把敌人也看成是纸老虎，那就会轻敌，犯"左"的错误。

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是对立的统一。藐视和重视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两者是相反的，互相排斥的，但是，两者又是相成的，互相渗透的。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是重视敌人的前提；重视敌人，善于斗争，是藐视敌人的保证。如果不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害怕敌人，不敢与敌人战斗，那就根本谈不到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了。反过来，如果在具体的战斗中不重视敌人，不认真对待，那就一定会吃败仗。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就会由轻敌变成畏敌，在战略上也就不敢藐视敌人了。比如，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再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和一切重大战略策略上，总是在指出革命必然胜利的同时，要准备对付最困难、最复杂的

情况，要求从重视敌人出发来部署军事活动。比如，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具体分析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既反对亡国论，又反对速胜论，并指示八路军要把勇敢战斗与谨慎精神结合起来，战略上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是一只纸老虎，战术上又把它当作是一只真老虎。这样就把藐视和重视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战争的实践也表明，藐视中有重视，重视中有藐视，藐视和重视是互相渗透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军事行动，在部署作战行动中，总是强调在战略上既要藐视敌人，又要重视敌人；反过来，在战术上既要重视敌人，也要藐视敌人。就是说，在每一个具体的战斗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不仅是战役和战术的原则，也是对战略的要求。正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作指导，所以全党同志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既藐视它，充满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又重视它，保持了严肃谨慎的态度，从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总之，只要我们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辩证地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把革命胆略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把勇敢精神与谨慎行事统一起来，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六）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

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①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敌我矛盾双方的实际情况，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思想，从而得出了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反革命军队虽然本质上是腐朽的，但其力量暂时还是强大的；革命武装虽然是进步的，但其力量暂时还是弱小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并且，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敌处外线，我处内线，敌追求速决，我则要拖住敌人，打持久战。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清算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其中第二个特点（敌人强大）、第三个特点（红军弱小）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

毛泽东同志为了逐步解决敌强我弱的矛盾，扭转战局，争取主动，具体地规定了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阐明了实行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②如果我军在战场上打持久战，拼消耗是拼不起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拖延时间又会使敌军得到援兵解救，就会陷我于不利之境。中国古代的孙子曾说过："兵贵胜，不贵久"，作战要力求速胜，拖久了，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因此，我军在每次战斗中，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以保持主动地位。

毛泽东同志的"持久中的速决"的战略思想，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抗日战争初期，他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矛盾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地揭示了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和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尖锐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首先抓住战争的时代特点，分析战争的根据，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本质。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任何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所在。

毛泽东同志又深入地分析了中日矛盾中日本方面的特点：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是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人力、物力之不足，国际形势之寡助。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深入地分析了中日矛盾中我国一方的特点：中国的短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是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又是一个大国，国际形势之多助。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构成了中日战争的基本要素，它规定了中日双方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规定了战争的进程和最后的结局。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之后，又从矛盾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和把握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敌强

我弱这个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可能是速胜。但敌小我大；敌之发动侵略战争是退步的，我之抗战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够得到外援。中日矛盾双方的这几个特点，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抗战八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中日矛盾的特殊性，得出的抗战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分析战争的矛盾运动，而且也适用于分析其它一切实际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方法论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之后，又深刻地阐明了战略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之间的辩证关系。内线持久的防御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是抗日持久战问题的两个方面，看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反的、对立的，实则两者又是相成的、统一的。在战略上坚持内线的持久战，就是要我们在战略整体上定下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长期同敌人打下去，直至彻底消灭敌人为止。只有在战略上采取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才能为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战提供一个总的方向。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战，反过来又有效地为实现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使很多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打成速决战，才能达到战略的内线、持久战的目的。由此可见，内线的持久战和外线的速决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军事“左”倾冒险主义者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忘掉了敌强我弱这个特点，片面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讲

持久，只讲速胜，犯了“急性病”的错误。右倾投降主义者也是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忘掉了我弱敌强这个特点，片面夸大了敌人的力量，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犯了“亡国论”的错误。

（七）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

凡是战争都有防御和进攻的矛盾，是贯穿于战争始终的基本的战斗形式，这是由战争的目的决定的。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古代打仗使用的矛和盾，矛是进攻武器，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武器，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打仗使用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 这就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与进攻、防御这个基本的战斗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正是从战争这个目的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为我们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而我们又是被压迫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者，只有很小的武装部队。对于我们和弱小的红军来说，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保存和发展力量以打破敌人的进攻，实行积极的防御，反对消极防御，通过持久作战，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逐渐使敌强我弱发生质的变化，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①这就揭示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本质区别。积极防御在指导思想上，是以保存军力，创造有利条件，准备进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导致战略进攻彻底消灭敌人为目的的。消极防御则相反，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而是为了单纯地挡住敌人的进攻，专以保存地方为基本目的。

毛泽东同志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体现了防御和进攻的辩证关系。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的一对矛盾，两者既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没有进攻的一方，就没有防御的一方；没有防御的一方，也就没有进攻的一方。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战争的双方为了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总是依据战争的客观情况，不是以进攻克服对方的防御，就是以防御抗击对方的进攻，这种斗争形式的反复，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之中。进攻和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任何进攻中都包含有防御，任何防御中也都包含有进攻，这就叫做攻中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毛泽东同志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军队的进攻，不是同时四面八方一起进攻，必须选择主攻方向。在向某一主要方向进攻时，对自己的侧翼方向、交通线、后方基地等则要加以防御。否则，就有被敌人迂回、包围和歼灭的危险。因此，在实施防御作战时，应以规模不等的进攻战相配合，抓住有利战机，适时地实施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在实行进攻作战时，应该以必要的防御相配合，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保障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比如，辽沈战役从整体上看是一个进攻战，但为了保障主力攻克锦州之敌，作为辽沈战役的组成部分的"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就是有名的防御战。战争实践证明，攻和防是互相渗透的，凡是能够按照攻防辩证法去指导战争的一方，就可以多打胜仗；反之，就要受挫折，打败仗。

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从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辅助的。但是，在战争的某个阶段，进攻和防御的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有时防御可能是主要的，有时进攻可能是主要的。一般来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要力量对比、作战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之变化，基本具备了反攻的条件时，就要依据具体情况，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时地把防御为主转化为以进攻为主，毫不犹豫地向敌人实行反攻，直至彻底打败敌人。当然，任何进攻，也必然以防御而告终，或者是进攻失利，不得不转入防御；或者是因胜利而结束进攻，单纯地无休止地进攻也是不存在的。

军事上的形而上学者，根本不懂得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他们认为进攻就是进攻，防御就是防御，二者是彼此孤立的。在实战行动上，进攻时只攻不防，是军事冒险主义；防御时只防不攻，是军事保守主义。王明的消极防御，就是忘记积极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一味被动挨打，是一种假防御。他完全无视战略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割裂了防御和进攻的内在联系。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防御和进攻，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要求战争的指导者必须正确处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攻防两种斗争形式，掌握有利战机，夺取战争的胜利。

（八）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抓主要矛盾和量变质变的原理在战术上的运用。它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军传统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军事指挥员在战场上无论处于怎样复杂、艰难的环境，首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集中优势兵力以解决主要的矛盾，就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古今中外许多战例证明，战役、战斗的胜利都是得助于集中优势兵力一着。相反，一些战役、战斗的失败则全在于分散

了兵力。

马克思说："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① 恩格斯也说："埃帕米农斯达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②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运用主要矛盾的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作战原则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的方针。他认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大军事原则时明确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③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军长期作战的实践经验所作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每次战役、战斗要集中几倍兵力于敌人，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因为敌人有强有弱，战场有主有次，地形条件有有利有不利，集中兵力的要求也有高有低，所以每个战役、战斗需要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5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3页。

集中优势兵力的程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以能否做到有把握地歼灭敌人来确定。在强大的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期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就是说，要把主要兵力集中用在主要的方向上，决不能搞平均主义。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① 可见，集中兵力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军队都能做到的。我军由于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进行的是爱国的正义战争，参战的广大指战员为人民而战的政治目的明确，又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因而我军能够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这是其他任何军队都不可相比的。在我军的作战史上，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仅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就进行了八十六次重要战役，歼灭敌人六百九十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随着战争的推移，经过量变到质变，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量变质变的原理指导战争实践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② 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是一个因果关系。集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优势兵力是打歼灭战的原因。各个歼灭敌人是打歼灭战的手段，而打歼灭战又是集中优势兵力的结果。要打歼灭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没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就不可能对敌进行分割、包围，加以各个歼灭。同时，还要看到，即使集中了优势兵力，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手段，同样也达不到打歼灭战的目的。因此，两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再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也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变内线为外线，变防御为进攻，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基本原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平均主义者，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等错误口号，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地同敌人拼力量，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是错误的，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错误的。其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反而为敌所制。后来，林彪又提出"一点两面战术"，其实质也是鼓吹打击溃战、消耗战，反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都是与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背道而驰的。

（九）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打败优势装备的反革命军队的历史，是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弱胜强的历史。过

去，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我军指战员凭着手中的武器装备，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创造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军事著作中，科学地论述了战争中的优与劣、强与弱、主动和被动的对立、联结和转化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为了提高大家战胜强大敌人的勇气，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一次就列举了中外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成皋之战等十个以劣胜优的战例，生动地说明了劣势的一方，只要战争指导路线正确，指挥艺术高出对手一筹，给敌人造成错觉，就能使劣势变为优势，弱变为强，被动变为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由于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比如“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待敌“再衰三竭”，采取敌疲我打的战法等等，都是以劣胜优的好方法。战争的实践证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更不是强者。相反，劣势而有准备之弱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击，把优势者打败。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刻地阐明了敌我双方优势和劣势的辩证关系。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优势和劣势、强和弱是互相联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从战

争这一事物的本质上来分析，强军不是一切都强，而是强中有弱；弱军不是一切都弱，而是弱中有强。毛泽东同志指出：日军虽强，但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错误；我军虽弱，但得到人民拥护，又有实行人民战争的优点。因此，看力量的优势与劣势，不能只看技术装备，还要看其它的因素。所以，优与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有时在弱点中又包含着优点，如游击队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敌人的优势，主要是指敌人的武器装备比较强，我们的劣势，主要是武器装备比较弱。但是，任何武器装备都不是万能的，有其长必有其短。古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敌人的武器装备机械化程度高，火力和机动能力强，是优点；但因此而要消耗大量的油料和弹药，受天候、地形的限制，勤务保障人员过多，战斗人员比例相对降低，又是其弱点。那种把敌人看得一切都优，把自己看得一切都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任何事物的长短和优劣都是相对的，优势装备和劣势装备也是相对的。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指导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役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方针。我们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讲的，但在战役战斗上则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以多对少，以强对弱的原则。比如，在淮海战役中，敌军八十万，我军只有六十万，在总体上敌多我少，

敌强我弱，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坚持从实际出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取得消灭敌军六十一个师的伟大胜利。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我集中二十五个师（不含阻援兵力和预备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十八个师；第二阶段我集中二十二个师歼灭黄维兵团十六个师；第三阶段我集中二十七个师歼灭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共二十七个师。我军集中兵力的实际结果，改变了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在具体战斗中由于实行以强击弱、以多胜少的原则，因而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优和劣、强和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有的强者更强了，弱者更弱了，或者是强者变成了弱者，弱者变成了强者。这里的关键是创造条件，没有必要的条件是不能转化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①当然，优势和劣势的相互转化，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艰苦过程的。一个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努力创造转化的条件，首先造成某一局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部的优势，一战而胜，然后再及其余。通过这种局部优势的长期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优势发展到全面优势，从而达到敌我优劣形势的根本转化。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战争矛盾运动的情况，唯物辩证地推断抗日战争必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最后胜利。他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在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在这一战略阶段中，就敌我力量来讲，双方都有向上向下两种变化，逐步地改变敌强我弱的状态，中国逐步上升，日本逐步下降，但这种变化是处于量变阶段中。战略相持的第二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达到平衡，敌我力量对比表现为势均力敌的状态。但从矛盾总体上看，仍然是敌强我弱，还没有发生根本质变，还是处在总的量变阶段之中。到了战略反攻的第三阶段，敌之力量下降，我之力量上升，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质变，我由劣势转化为优势，敌由优势转化为劣势，直至敌人彻底失败。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推断抗日战争必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是科学的，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预见的伟大力量，在战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十）兵民是胜利之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也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对战争的胜败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没

有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能实现的。恩格斯说："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①列宁也说："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地实现。"②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导战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独创性地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的也在这一点。"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时又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战争所需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

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

②《列宁全集》第27卷，第94、9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21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478页。

之木，就会一事不成。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仅从著名的三大战役来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上也给了极大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支前民工就达五百多万人，担架十万多副，大车三十八万多辆，牲畜一百多万头，粮食九十五亿斤，等等。很显然，如果离开了这种人力、物力的支援，要取得这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的观点，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还深刻地阐明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他特别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就说明人民军队在人民战争中是骨干力量，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但是要进行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阶级敌人，光有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人民群众作基础，人民群众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论证人和武器的关系中，进一步肯定了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战争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整体。但是，任何战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和武器总是它的基本要素。在军事史上，在对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其作用的看法上，存在着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唯武器论，片面夸大武器的作用，认为武器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另一种是唯意志论，片面

地夸大人的精神作用，贬低和否定武器的作用，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人的意志或神灵决定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①又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②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具体地论述了人和武器的关系问题。他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这个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人和武器的辩证关系，肯定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人这一要素首先是一种物质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不仅是一物，而且具有物质活动和物质力量，能够作用和改变其它的物质形态。如果人的体质不好，行军打仗，艰苦的战争生活就经受不住，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人又有思想、目的、意志等精神因素，这是人区别于任何物的特性。人的实践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能动的。人能够制造和使用武器，能动地夺取战争的胜利，人本身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要素，把人的因素只看成是物质实体或只看成是精神因素，这都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的同时，又强调武器也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战争不同于其它任何斗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2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437页。

争形式，是一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使用武器，任何人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斗争都不是战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武器就没有战争。但武器只有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的战争力量。如果离开了人，任何先进的武器也不过是一堆废铁。我们历来坚信，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但又不否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出现和更新各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如导弹、核武器、电子技术等，因而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看不到现代化武器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不使各方面都适应新式武器的要求，那是要犯错误的。当然，武器与人相比，人是第一位的决定的因素，武器则是第二位的被人使用的因素。无论武器怎样先进，威力如何巨大，它都是为人所发明和制造并由人去掌握和使用的。有了人才有武器，没有人就没有武器。可见，唯武器论者是站不住脚的。当原子弹这种新式武器出现以后，帝国主义把这种核武器看作是主宰世界的神物，鼓吹原子弹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强调指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①"。这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唯武器论者的谬论。

毛泽东同志运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基本原理，精辟地提出只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并在战争中走群众路线，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1091页。

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支援战争的政治热情。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 毛泽东同志从这个思想出发，主张尊重士兵，尊重人民群众，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去动员全国军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坚决抗战，这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靠什么力量战胜敌人？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最根本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一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之中，它是运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于战争实践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为了依靠群众和团结士兵进行人民战争，针对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人民军队主要是来自农民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和武装他们，彻底肃清一切旧式军队和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影响，才能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并夺取战争的胜利。根据这一基本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整套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并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由于从政治思想上加强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在军队内部实行官兵一致，在军队外部实行军民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448页。

一致和军政一致，因而广泛地调动了全军全民的积极性，参加和支援人民战争，为彻底打败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同志为了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还提出了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的思想；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运动战和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思想等等，这对于充分调动军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积极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同志为了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还提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②这个思想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的坚实性和彻底性，是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只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战胜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94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387页。

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战争中的生动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作出的独创性的贡献。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来源于战争实践又指导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科学真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军事技术装备不断改善，战争条件不断变化，但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战胜敌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如果丢掉了这个思想武器，我们就失去了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时，既要坚持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又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灵活地运用于新的实践，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未来的战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第四节 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革命转败为胜。并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在革命斗争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我党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这不仅在政策和策略的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成功的运用，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和哲学思想。

（一）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深刻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批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本本主义”，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主观地指导革命斗争，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指出“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

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① 共产党人严格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出发，客观地考虑事物发展的进程，对社会的情况和阶级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确定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为指导，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及其变化，把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辩证地统一起来，为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比如，毛泽东同志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制定，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对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阶级关系的分析，以及长期的革命实践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也是从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首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分割的半殖民地状况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独霸全中国；另一方面，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屈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5页。

服的政策。当时我们党内也存在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他们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一策略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等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客观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建立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这一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的客观根据。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从客观实际出发，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本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根据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制定了正确地进行世界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是对世界政治力量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对国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科学地估量后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不仅善于对国内形势作科学的分析和估量，而且善于对国际形势作科学的分析和估量。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根据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明确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及在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的思想。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论"。本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世界政治力量已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情况，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美帝国主义那种"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大风暴，大多数国家相继宣告独立，成为反帝反霸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于1974年2月

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明确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①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认真总结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制定政策和策略中的具体运用。

（二）政策和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时，必须坚持革命原则，同时又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因此，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实行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的一个根本特点，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他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制定和实行政策和策略时，必须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要忘记革命的战略目标，绝不能为了眼前

①《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转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1326页。

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①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战略原则上保持坚定性和严肃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办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毛泽东同志还十分重视策略的灵活性。他要求我们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使策略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策略的灵活性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革命形势经常会发生变化，有时比较顺利，有时比较困难，甚至有时遭到挫折和失败。所以，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讲究灵活性，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形势，采取适合情况变化需要的斗争策略。一般说来，在革命的高潮时，党的策略是进攻的，采取比较公开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无产阶级政党则实行正确的退却策略，采取隐蔽的秘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有合法条件可利用时，党的策略就应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积极展开斗争，以便教育群众，扩大影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960页。

响，积蓄力量，准备最后战胜敌人。如果在革命斗争中，不讲策略的灵活性，不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只采用一种斗争形式，或者只在一条战线上、一个方向上进行斗争，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那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重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这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相反的，对立的，又是相成的，统一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互相排斥的，但又是互相联结的。一般说来，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基础，灵活性是为实现原则性服务的。如果不坚持原则，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忘掉根本利益，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那就会犯右的错误；相反，如果只讲坚持原则，不顾具体情况的变化，盲目地一味采取某种行动，那就会犯"左"的错误。所以，离开原则性讲灵活性，或者离开灵活性讲原则性，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战略家，又是讲究斗争策略的艺术大师，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从战略上讲，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是人民大众的心愿，是历史的必然，必须坚持革命原则，这是毫不动摇的无产阶级立场。但从策略上讲，斗争形式必须是多样

的、灵活的。如果不坚持原则或不讲究斗争策略，那就会犯右倾保守主义或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革命锋芒是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但在策略上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壮大红军队伍，采取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通过反“围剿”的形式，一仗一仗地来消灭蒋介石的反革命军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便采取了既同他的反共政策作坚决斗争，又争取和团结他共同抗日的巧妙的两手策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采取了假和谈、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时的情况是：由于长期进行战争，人民渴望和平；我们的朋友和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士也对和平抱有幻想；共产党内也有某些同志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他也抱有幻想；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右倾妥协的思潮，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放下了武器，有的领导人到资产阶级政府当官去了。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原则是：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① 全党必须充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1052页。

做好战争准备，用武力彻底消灭蒋介石。但是，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同志由于坚持了革命原则，又注意了斗争策略，因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击破了国民党的阴谋，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同时，也取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国内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伟大革命实践，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谈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时说："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性，超出原则的让步和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和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符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斗争时，既不能借口讲灵活性而放弃原则性，也不能把原则性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讲的灵活性是在坚持原则性前提下的灵活性，而不是象右倾投降主义者那样，借口灵活性来抛弃原则性，背弃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目标；同样，我们讲的原则性，也是允许策略灵活性的原则性，而不是象"左"倾冒险主义者那样，借口原则性来反对灵活性，把原则性当成千古不变的教条，这都是违反革命辩证法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对中央、上级的政策是不能违背的，是必须坚决执行的。这是实行政策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性。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具体执行的方法，应当是有差别的，不应该千篇一律，这就是实行政策时所必须采取的灵活性。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三）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许多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策略思想，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伟大思想。列宁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团结同盟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依靠少数人不行，必须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打败强大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的敌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唯物史观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运用。因此，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无论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以极大的精力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统一战线继续成为战胜敌人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之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国内阶级的新变化，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降日派和驱逐日本侵略者。这就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指明了主攻方向和打击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制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创造性地解决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问题。

在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机会主义者割裂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系，把联合和斗争绝对对立起来，或者绝对统一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讲同一性，不讲斗争性。离开斗争性的同一性是僵死的，没有内在根据的绝对的同一。这种思想表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就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一味迁就国民党反动派，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脱离同一性的斗争性，必然

是盲目的乱斗一气，破坏事物的发展。这种思想表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就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其结果，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由于他们根本不懂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决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看不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分不清敌、友、我，因而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

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建立的时候，“左”倾关门主义者王明，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观地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把中间势力定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采取打倒一切的“左”倾政策。这种“左”倾关门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他们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既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也不承认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内部矛盾。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因此，他们在革命策略上，不会利用敌人矛盾，寻找同盟者，主张打倒一切，否认联合。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确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解决了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批判关门主义的策略是一种“左”派幼稚病。他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

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在一定条件下是可变的。因此，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这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所以，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扭转了“左”倾关门主义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这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措施，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特别是我党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震惊了国内，而且也震动了世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更加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热情，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当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主要危险。他们只讲同一性，不讲斗争性，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共”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和坚持抗日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

统一，又独立。”① 这就充分说明，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错误的。当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体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认真地总结了1921年建党以来实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从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发表了《论政策》一文。他在报告中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论述了“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 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那怕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同盟者，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打击主要的敌人。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革命就会失败。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同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联合、统一中看到了矛盾和斗争，又通过矛盾和斗争达到了联合、统一的目的。在联合和斗争的辩证统一问题上，我们党既反对了只看到联合，看不到矛盾和斗争的右倾错误，又反对了只看到斗争，看不到联合、统一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扩大和巩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①所谓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广大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力量。这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依靠力量，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为抗战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所谓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它们既不是革命基本动力，也不是革命对象，而是联合、争取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看到它同各国资产阶级有共性即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个性、特殊性，即在经济上很软弱，政治上受压迫，同反动势力有矛盾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治态度具有革命性和动摇性两个方面，特别是在受到国际资本主义打击时，其动摇态度更为明显。因此，在抗战时期我们的政策是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必要的批评以争取团结他们。在中国，由于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而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所谓反对顽固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同革命人民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当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抗日派和降日派是有区别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降日派，出卖民族利益，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抗日派实际上是反共顽固派，只是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尚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又执行摧毁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的政策。既然他们还愿意团结抗日，那我们的政策就应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留的时间越长越好；但又因为他们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企图消灭我们，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对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只有坚决斗争，限制其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能保护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迫使他们保持同我们的合作，避免发生内战，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①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由此可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的生动表现。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争取、团结了中间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扩大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也只有反对顽固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总之，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运用和生动的体现。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使统一战线工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方面，我们党联合了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曾经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调集数十万军队"围剿"红军达十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又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我们党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因而还是联合他们抗日，同他们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我们党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

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坚持抗日爱国人士，采取不同形式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有效地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使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样，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继续贯彻了这一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了更加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解放后，我们党继续贯彻了这一政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实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国际反霸三大历史任务，离开统一战线是绝对不行的。这就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四）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对敌斗争策略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对敌斗争中，十分重视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具体地分析敌人的特点，加以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同志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了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掌握斗争的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谈对谈，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政策；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生活出路的政策，等等。毛泽东同志为我

们党制定的这些对敌斗争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完全正确的，在对敌斗争领域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哲学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敌人要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只有区别对待才能分化瓦解敌人。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针对其两面性，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他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①即使是顽固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会分化的。因此，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实行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实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我们的政策也要有两面性，即对他们尚不愿根本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采取联合的政策；对他们向我党和人民施以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方面，采取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对顽固派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同志为我党规定的策略原则是："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②只有善于利用矛盾，才能争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取到多数，只有争取了多数，才能做到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少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反对少数最主要的敌人，才能有效地争取多数，最后达到各个击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的目的。抗战胜利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充满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策略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它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多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矛盾，孤立和打击了最顽固的敌人，最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对敌斗争要抓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主攻方向。他在总结我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时指出，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击极少数。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对敌斗争中，只有集中力量，坚决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不搞四面出击，才能促进敌人内部发生分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敌人很多，但我们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集中主要力量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在解放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就集中全力消灭蒋介石反动派。建国初期，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要做的事情确实是千头万绪，从哪里抓起？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

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稳定资产阶级”的政策，“缓和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为了更有效地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如果同时向民族资产阶级开火，那就会形成四面出击，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负担，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土地改革中暂时不打击富农的政策，也是为了孤立地主，更好地团结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由于正确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策略思想，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主要敌人，因而圆满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迅速恢复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遭受多年战争而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于1952年底已经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彻底消灭最顽固的敌人，还为我党规定了“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的政策。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阶级敌人也是一样，不是铁板一块，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变化的。只要我们认真地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个高度出发，提出了优待俘虏、“给出路”的政策。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我党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①。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瓦解敌军工作的作用，明确规定了优待俘虏的四项原则，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壮大了红军的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论持久战》中，明确地把瓦解敌军、优待俘虏规定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后来，在《论政策》一文中又指出，“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②，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党我军严格执行了优待俘虏、“给出路”的政策，因而不仅瓦解了大批伪军，而且也瓦解了侵华日军。有些日军士兵愿留在八路军中，并参加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我党我军继续认真地执行了优待俘虏、“给出路”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5、726页。

政策，因而使许多敌人自动放下武器，向我投诚，经过教育后，有的很快就加入了人民军队，调转枪口打击共同的敌人。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军共歼敌八百多万人，其中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达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余人，俘虏多达四百五十余万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①建国以后，我们认真地执行了这一政策，成功地把绝大多数反动阶级的成员和反动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总之，"给出路"的政策，是一项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对敌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之一。

第五节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辩证法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辩证法。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1366页。

（一）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红和专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对立的统一。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政治和经济是一对矛盾，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政治为经济所决定，但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精神对于物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思想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起着动员、组织和改造作用。先进思想一经出现，它就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和清除旧的意识。

毛泽东同志坚持经济和政治、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只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才能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否则，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走上邪路。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是：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党的政治领导；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矛盾，协调和改善党内外的各种关系，使之团结一致；提高革命觉悟，振奋革命精神，激励革命干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做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和保证。离开了这些条件，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就会脱离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不能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也就不能实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任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以共产主义思想，包括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来教育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更需要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培养一代代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奋斗。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

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动作用，与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但要有革命精神，而且要有求实精神，发扬主观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在客观规律面前人是能动的。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福利。所谓按客观规律办事，并不是撇开人们的认识和活动，绝不能排斥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才能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客观规律的要求变成现实。因此，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但不排斥思想政治工作，而且需要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任何否认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轻

视、忽视甚至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都是错误的。当然，把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动作用同尊重客观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客观规律，同样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政治与技术、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① 红与专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所谓红，就是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等等。所谓专，就是指生产技术、经济管理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这就是说，专不等于红，红也不等于专，它们是相互区别的。然而，红与专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政治与技术也是如此。一方面，专不能离开红，技术不能脱离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为技术指明正确的方向，技术业务脱离了政治的正确指导，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就会迷失方向，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同志指出：搞业务，搞技术，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另一方面，红也不能脱离专，政治也不能脱离技术、业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样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也就不能很好地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口头上讲

---

①《工作方法（草案）》，转引自1970年4月18日《解放军报》。

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实际上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钻研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不去积极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那就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不专的红，不是真正的红，真正的红必须与专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各行各业的人员要坚持政治和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要既懂政治，又要懂业务、技术。他要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①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要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为要坚持红与专、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就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②空头政治家不懂业务、技术，只红不专；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问政治，只专不红。这两种倾向从不同方面割裂了红与专、政治与技术的对立统一。从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结来看，空头政治家不是红，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不是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坚持红与专的统一，政治与技术的统一。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48页。

②《工作方法（草案）》。转引自1970年4月18日《解放军报》。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也是符合事物的推陈出新、新陈代谢发展规律的。他多次说过：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的发展，就是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它们之间不但互相区别，而且互相依赖，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真理作比较，就无所谓谬误，而没有谬误作比较，也就无所谓真理。在科学文化领域，允许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的自由发表和讨论，有比较，有鉴别，在对立物的相互比较中，提高认识能力，鉴别什么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什么是假的、恶的、丑的东西，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等等。真理不仅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而且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在同宗教迷信、谬误邪说的斗争中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在科学文化领域，只有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不同意见的争鸣辩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分清真与

假、善与恶、美与丑，克服谬误，发展真理。在文化艺术领域，只有允许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作品存在，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才能在互相竞争中求得推陈出新向更高程度发展。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只准放香花，禁止毒草出土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出要重视反面教员作用的辩证思想。他认为要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需要研究与它对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认识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这样反复多次的实践、认识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① 任何科学上的新发现，艺术上的新成就都不是一次成功、一成不变的，而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文艺科学的新成果，都不是直线地发展，而是在斗争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51页。

中曲折前进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的，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鉴别清楚的。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如果用行政命令手段，轻率地下结论，是不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对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

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肯定和否定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时，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阐明了批判和继承的辩证法。他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的联系以及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联系。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任何时代的新文化，首先是对该时代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但它又不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凭空创造出来的，这是它的来源。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尊重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坚持批判和继承的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的发展都是新东西否定、代替旧东西的过程。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定，不是抛弃一切，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联系的环节。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既不能一概肯定，全盘拿来，也不能一概否定，统统抛弃，而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把批判和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就是把批判和继承统一起来的典范。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那它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 "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③ 另一方面，他又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6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出：吸收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这就告诉我们，对待古代文化遗产，要进行辩证的思考，采取辩证的方法，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必须否定的东西，在否定中有肯定，在肯定中有否定，坚持肯定与否定、批判与继承的统一。肯定和吸收对“今天用得着的东西”，肯定是为了发展今天和未来，要古为今用，引导人民群众向前看。尊重历史决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中国的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②我们反对无批判地肯定一切，全盘继承，也要反对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排除一切。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态度，这对发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是极为有害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方针，同样适用于对待外来的文化艺术。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因为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所以，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指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而且“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4页。

东西，都应该吸收。”①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要吸收外国的长处和先进的东西，抛弃它们的短处和落后的东西。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那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使是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形式主义地生搬硬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②因此，吸收外国的文化，应当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外国文化中进步的东西、好的东西，对我们适用的东西，要“洋为中用”，更好地发展自己，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决不是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更不是奴隶主义、崇洋媚外。

（三）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时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66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4页。

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①。从个人的经济地位、阶级成分来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阶级，其中有的是雇佣劳动者如演员、歌女等，有的是自由职业者如自由开业的医生，自行设馆的教师，自行研究的发明家，自行演出的艺术家等。从政治立场来说，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方面由于他们受本身社会地位的影响，与工人、农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同情工农，反对剥削，政治上有较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旧社会，多数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并处于高出一般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治态度，既有同情工农的一面，又有脱离群众、傲视工农的一面，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动摇、妥协的一面。周恩来同志指出：“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经受了建国以来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同时，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百分之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

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9页。

九十以上都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因此，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来源时指出：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来交换老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①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一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都是被命运联在一起的被剥削者。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共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在我国，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由于知识分子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走在一般

---

①《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3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

人的前面。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是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揭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是一大批“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年轻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的，就有从知识分子队伍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共产主义者和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作先导，就不能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地阐明和充分地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绝对必需的智力因素。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知识分子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依靠力量，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肩负着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战略任务。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技术专家，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列宁曾经指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②因此，一定要看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依靠知识分子这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47页，第368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1页。

党和毛泽东同志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又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①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② 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获得进行精神生产的原材料，创造各种精神产品。如果脱离工农群众的社会实践，创造精神产品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因此，毛泽东同志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去创作出洋溢时代精神，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产品。一切革命理论都是为实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惊醒人民，感奋人民，鼓舞人民，推动人民的有力武器。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干，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69—370页。

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真正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巨大力量。

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发挥知识分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深刻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知识分子只有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进行。知识分子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途径，就是深入群众，参加社会实践。周恩来同志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这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②这就是说，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才能逐渐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也只有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才能逐步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8页。

会以来，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和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密团结，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一定要继续克服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同知识分子建立如同工人、农民那样的真正的同志关系，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同时，我们要继续倡导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行知识分子同工人、干部三结合，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把自己的工作同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更好地有成效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第六节　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在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的唯物

的历史观，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创立了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一）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一对矛盾。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组织建设的纯洁性和群众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①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但使无产阶级日益觉醒，而且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小资产阶级分子中的许多人愿意放弃其原有立场，要求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大胆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注意吸收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强调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他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中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9页。

党的建设中，把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保证了党的组织的群众性和纯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是解决党组织的纯洁性和群众性这一矛盾的基本形式。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认真地执行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既可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又可避免放松政治警觉性的倾向。当然，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两个方面，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能把“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绝对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地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果只讲党组织的纯洁性，片面强调“谨慎发展”，那就会丢掉党组织的群众性，而陷入关门主义错误；如果只讲党组织的群众性，片面强调“大胆发展”，那就会忽视党组织的纯洁性，而犯右倾错误。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对“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的割裂，是形而上学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表现，只有把“大胆发展”和“谨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既扩大党的组织又保持党的纯洁性，使我们的党成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毛泽东同志从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出发，应用矛盾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解决思想矛盾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

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 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党员的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这个特殊性，因而在我们党内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其主要表现又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此而决定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内容，就是在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思想矛盾和解决其他矛盾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特别是党内的思想矛盾，是属于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把矛盾性质和斗争形式的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党的思想建设，创造了整风运动的方法，以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如1941年到1943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肃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实践证明，整风运动是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新创造，它生动地体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的原理，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的保证，而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统一。他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在这两个方面中，党的思想建设占主要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对于思想建设的重要作用。他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因此，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整顿党的组织，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特别强调了思想建设对于组织建设的重大作用。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③所以，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思想上整顿党，才能达到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结和统一，使我们的党更加巩固和发展。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一建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6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页。

党方针，从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发展史表明，首先着重思想上建设，同时注意组织上建设的建党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党的建设中的客观辩证法。

（二）党内的民主和集中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① 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党必须按照民主和集中的矛盾运动规律，把党员有机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产生无穷的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党内的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② 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一方面要有高度的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2页。

民主，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负责精神，使他们工作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发扬他们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有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求全党同志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可见，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这两个矛盾着的侧面是互相制约又是互为条件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①因此，在党内生活中，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在认识运动中大体上就是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也就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将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意见，制定出方针、政策、办法，这也就是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就是将完整的系统的意见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办法，再到党员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变成党员群众的实际行动，这也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关于前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2页。

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关于后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说：“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② 这就“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③。这就是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广大党员才能按照具体情况灵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述两个过程的紧密结合，有机的统一，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的辩证统一。可见，民主——集中——民主的运动过程，也就是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过程。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人们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所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党内民主集中制，还体现了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辩证

---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 8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4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494—495页。

统一的关系。党的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统一，也就是党员群众和党的领导者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没有群众更不行。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坚持民主制，发扬党内的民主，就是相信和依靠党员群众；坚持集中制，就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② 因此，坚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在党内生活中体现了领导和群众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割裂民主和集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两种错误倾向，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要反对压制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要集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指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党委的领导，是集中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独断。在党委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①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甚至压制民主，搞家长制，一言堂，就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倾向，是一种割裂民主和集中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甚至反对党的统一领导，搞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也是一种割裂民主和集中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因此，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必须反对专制主义倾向，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维护党的统一，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了真正贯彻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重申党的纪律，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法规。坚决贯彻执行《准则》和新党章，严格而正确地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就能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9页。

（三）党内的斗争和团结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关系的原理。深刻地分析了党内思想斗争存在的原因，论述了党内斗争的客观性，他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① 因为我们的党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只要中国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那么，在一些党员中就不免带来反映旧社会的污浊东西。还因为党员所处的地位及其实践的范围的不同，在认识问题和思想方法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形成党内不同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② 所以，党内的思想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刘少奇同志说："问题的中心，不在于党内有无不同的思想意识，有无意见上的分歧，这是一定有的。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③

毛泽东同志深刻阐明了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他在《党的团结的辩证法》一文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第27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53—154页。

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斗争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一方面，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团结必须求大同存小异，斗争则不讲情面，严肃地揭发错误，开展批评。另一方面，团结和斗争又是统一着的两个方面，团结之中包含着批评和斗争，斗争之中包含着团结与和谐。只有坚持批评或者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才会有真正团结的基础；只有抱着团结的愿望，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的要求，善于斗争，通过批评或者斗争，真正达到党内的团结。因此说，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认为，团结和斗争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是提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正确方法的客观根据。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这样，就把团结的愿望和正确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把这种结合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表示，团结是批评或斗争的出发点，又是批评或斗争的归宿。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团结制约着斗争；斗争是使原有的团结飞跃到新的团结的中介环节，是手段，斗争也制约着团结。团结和斗争相互联结又相互制约，促使党内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使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

在党内团结和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反对只讲斗争不要团结的

惩办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自由主义是使党内团结涣散、纪律松懈的腐蚀剂，是一种言行不一的假马克思主义，它“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①。它取消党内的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团结，割裂团结和斗争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惩办主义是破坏党的团结，混淆党内矛盾性质，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整自己的同志，对党危害极大，是“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党内斗争发生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均衡地存在于党内。一般说来，政治上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自由主义容易在党内泛滥；政治上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惩办主义在党内更易推行，因此，要根据党内的实际情况，注意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在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掩盖着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毛泽东同志说：“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②只要我们按照党内团结的辩证法办事，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四）党和非党

中国共产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民主党派、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

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①党同各族人民、同各民主党派、同各人民团体之间都有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把这些方面的联系汇合起来，就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分析了党同群众、党同各民主党派、党同各人民团体之间具体联系的不同特点。首先，他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说："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单有党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党是群众的代言人，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党靠群众才能生存和发展，群众只有靠党的领导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当然，党和群众之间由于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条件不同，因而也会发生一些暂时的、个别的、非根本的矛盾。但党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暂时的、个别的、非根本的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党群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的客观依据。

其次，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特殊关系。他说："长期共存，

---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第4页。

互相监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①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但是，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毫无矛盾的共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的原因，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对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因而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就有一个相互提意见、开展批评的互相监督的问题。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只有认真地实行互相监督，才能团结合作，互相促进，长期共存；只有互相推心置腹，同心同德，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按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这种辩证关系的客观要求，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一定能不断地加强和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强调我们党同非党人士、同各民主党派，不但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党中央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丰富和发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50—351页。

展。

再次，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党和政府、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党必须领导政府和人民团体，政府和人民团体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他说："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①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等。但是，政府以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又有本身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毛泽东同志说："青年团除了应继续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外，还要有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②因此，政府和各人民团体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通过政府和各人民团体来贯彻执行，使它们各负其责，各有其权，各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就是共产党和各人民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党正是依靠党和非党之间这些客观辩证法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才赢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七节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毛泽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2页。

②《接见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引自1953年7月3日《人民日报》。

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转过来，拿这样的世界观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单独的方法论。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十分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重视方法论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马克思早就说过：从前的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称作"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②。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③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④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运用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实行路线、方针、政策的一切活动中，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化为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创立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法和工作方法。从而使哲学理论走出了单纯的理论论述和理论论战的范围，而与无产阶级政党、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真正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创立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新领域，以独创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发生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有着显著的历史特点。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中的敌我关系的复杂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革命发展的前进与后退、高潮与低潮的多次反复性；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根据地斗争与白区斗争、军事斗争与思想斗争等革命斗争形式的极其多样；中国革命的最大同盟军农民，有强烈的革命性，而又文化落后，经济分散，这又决定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困难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又面临着复杂众多的革命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特别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所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理论，是适应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中国长期而又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形成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无产阶级的方法论，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观，它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实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广泛地运用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各项工作，巩固和发展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的："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于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反过来又影响着世界观。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于科学的世界观的确立和巩固起着促进的作用。一个革命者不仅要在主观上有拥护马列主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愿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望，而且要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能够做到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才算做比较全面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坚持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经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活动方式。如主观片面、因循守旧、狭隘自私的思想，照抄照搬，单凭会议布置工作，靠多发文件指导工作的方法，以及推诿、拖拉、划圈不表态的活动方式等。这些都是同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根本对立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批判和克服这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活动方式，改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代之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代之以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客观全面的辩证思维方式，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活动方式。这样才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专门论述，这里不重述。下面，就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其他重要内容，选择主要的加以概述。

（一）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

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②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所谓认识世界，第二件就是所谓改造世界。为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而要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

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于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此，只有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的而又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只有根据正确的方针、政策去行动，才是正确的行动。也只有正确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正确的决心和方法，来自于对实际情况的深入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③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同样，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从实际出发。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分析后制定出来的，它正确地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映了事物的共同特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但是，客观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只反映了事物的一般情况，而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具体情况，更不可能包括新发生的具体情况，即使是原有的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呢？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通过实践首先得到感性认识，然后经过头脑的思考作用，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从而得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实现这样的认识过程，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②"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③。陈云同志也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④

调查和研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体现着感性认识和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1页。

④《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155页。

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调查，就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广泛地收集材料，了解和掌握客观实际的真实的全面的情况。所谓真实，就是调查的材料必须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谓全面，就是要了解客观对象的各个方面，了解它的现状和历史，了解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这就要有踏踏实实、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广泛深入地接触群众，真心实意地向群众请教；要有科学的方法如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社会调查也可开调查会、登门访问、个别交谈、看材料、听汇报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手段等等。最根本的是深入现场进行直接的调查，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要深入实际，亲自动手，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研究，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思考的作用，掌握事物的内部联系，获得理性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要做到这一点，一要尊重客观实际，占有材料。在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时，要从实际材料出发，找出事物自身的逻辑、内在的联系，而不能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不能以主观的愿望剪裁调查的实际材料。二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即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理论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过，分析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也就是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继续和升华。调查和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

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是同主观主义的方法根本对立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追溯其犯错误的原因，都是由于离开

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工作方针，从根本上违背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顺利；什么时候违背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受损失。因此，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坚持和发扬的科学方法。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论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提出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过程。他说：人类认识运动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认识规律和实际经验，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

险。”①

一般，是从同类的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是共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任务，就是科学地指挥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发出一般的号召，制定一般性的方针，提出一般性的要求，是完全必要的。一般号召可以使领导机关的指示、方针和政策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为实现一定的任务而斗争。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借口情况特殊拒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是错误的。

但是，一般号召必须同个别指导紧密地结合起来，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一般号召是在个别指导的基础上产生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口号只能从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中获得，从许多个别的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利益。同时，在个别指导基础上形成的一般号召、方针、政策必须回到个别指导中去，使之进一步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并变为群众的行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空洞无物的一般号召，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深入实际进行个别指导的重要性。他说："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②离开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而且使一般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挥。总之，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出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全部过程。

毛泽东同志根据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提出了“解剖麻雀”、“典型试验”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个性中寓存了共性，解剖了个别事物，就能从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只有深入一点，进行细致的解剖分析，才能总结出一般性的认识和原则来，从而指导全盘工作。

从典型调查中得出的正确认识，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先进经验，一般说来，是符合客观情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可行的。然而，在贯彻一般的指导意见，推广先进经验时，一般说来，也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而必须采取“一切经过试验”、“种试验田”、“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因为各个地方和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接受别地经验，决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就必须深入一点进行试验，先在一个或几个地方组织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广，指导全盘。这样，就能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好，使各项事业积极稳步地向前发展。

（三）两点论，抓主流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于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提出了内容极为丰富的两点论，抓主流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的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看问题、办事情就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或者两分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它要求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对待任何事物都坚持矛盾的观点，自觉地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

毛泽东同志的两点论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用两分法看待形势和工作，既要看到好的方面，成绩方面，又要看到不足方面，缺点方面；要分析有利条件，又要分析困难条件；在顺利面前要冷静清醒，在困难挫折面前要沉着坚定；在黑暗中要看到光明，在光明中要看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正确处理革命和建设、政治和经济、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劳和逸等矛盾着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也要坚持两点论、两分法，正确地处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人和组织、少数和多数、下级和上级、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等方面的关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

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待好事、坏事也要有两分法。坏事好事都有两重性，在一定条件下，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把坏事变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待事情的发展趋势，也要坚持两点论，要有两手准备，充分估计到两种可能性，即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力争实现好的可能，准备应付坏的可能；向最好处争取，向最坏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取得主动权，等等。总之，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两方面去分析处理问题，要在矛盾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做到全面、联系和客观地看问题。

两点论同一点论是根本对立的。一点论的突出表现是形而上学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如在分析工作的客观条件时，说顺利，就一切皆顺，没有半点困难；说困难，就一切皆难，没有半点有利条件。在总结工作时，说好，就一切皆好，绝对的好；说糟，就一切皆糟，绝对的糟。看某人某单位的工作，说先进，就处处先进、时时先进；说落后，就事事落后、永远落后，等等。这种方法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否认了事物的矛盾性，把事物看成是绝对的统一，铁板一块。毛泽东同志说：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既要两点论，全面地看问题，又要本质地看问题，抓主流。他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

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所谓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看问题，办事情，首先要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要善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毛泽东同志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②我们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解放人民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奋斗，因而一般说来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而缺点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所以，我们看问题必须分清主流和支流，区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指出缺点。只有抓住主流，看清本质，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把握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看问题要看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同时也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看成为本质和主流方面，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泽东同志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4页。

关于抓主流、抓本质的方法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所必须遵循的科学方法。

（四）抓中心，“弹钢琴”

毛泽东同志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出了抓中心，“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还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①把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运用于实际生活，也就是指抓中心工作、抓重点、抓关键。毛泽东同志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②这就是说，在领导工作中，要善于在工作繁多、错综复杂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情况下，区分主次、轻重、先后、缓急，进行适当安排，集中主要精力抓好中心工作，解决重点问题。那种不分主次的平均使用力量的工作方法，是一种否认矛盾不平衡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中心工作是各种工作中带关键性的工作，抓住了中心，就能把握住整个链条，带动其他工作。领导者应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能带动全局的中心工作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最善于捉住主要矛盾，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在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抓住各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对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估量，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民主革命时期，抓住了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又抓住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集中力量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决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有利于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而次要矛盾的解决与否，又有利于促进或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反过来促进中心工作。因此，应该在抓住主要矛盾做好中心工作的同时，把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围绕中心工作而开展其他工作。毛泽东同志把抓紧中心工作和又要开展其他工作的关系比喻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①如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相配合，革命就会失败。可见，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必须互相配合，不能只抓中心工作，而忽视或放弃其他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防止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工作方法，也要注意防止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以中心工作代替其他工作的“单打一”的方法。

（五）胸中有数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要正确地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质，而且要认识事物的量。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运用质和量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① 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对情况和问题作基本的分析，运用基本的统计和百分比，特别是把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避免主观片面性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红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数量关系时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②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辩证地看待多与寡、强与弱的矛盾，巧妙地运用量变和质变的规律，积极创造条件，集小胜为大胜，变战役战斗的胜利为战略的胜利，最后使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质变，达到驱敌出国的目的。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对战争形势进行了基本的数量分析，他说："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页。

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① 毛泽东同志谈到的三个“二十五”，这是个数量关系，它深刻地阐明了事物的量和质的对立统一，事物的量变超过一定界限就要引起质变。通过对这些基本的数量分析，指出了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

“胸中有数”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做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对事物基本数量的分析，掌握事物的数量界限，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好地按客观实际情况办事，防止工作中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六）波浪式前进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2页。

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 "波浪式向前发展"，这是总结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的理论概括。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又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②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批判战争机械论和唯心论的观点时又指出："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③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把波浪式前进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④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要处理好各个经济部门的关系，波浪式前进。他说：我们的经济问题，要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因此，要学会运用缓和急、紧和松、劳和逸、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统一，来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使各项工作都有秩序有节奏地波浪式的进行。

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把肯定和否定规律的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生动体现和独特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12页。

的创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运动。肯定和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波浪式、螺旋式前进的观点表明，事物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又是曲折的、起伏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客观过程总是循着“之”字路前进的。“曲则全，枉则直”。为了一跃而后退，往往跃得更远；为了一起而一伏，往往起得更高；为了进攻而退却，往往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波浪式前进的辩证方法，既要反对只伏不起，只后退不前进，以平静无波的主观愿望来要求“不尽洪流滚滚来”的现实世界；又要反对只起不伏，只前进不后退，要搞高潮就只一股劲儿的一直高上去，要苦战就一股劲儿的一直苦战下去，如此等等。只伏不起和只起不伏都是形而上学的直线性观点，用这种方法指导工作必然要犯错误。

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螺旋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这种曲折是前进发展中的曲折。毛泽东同志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我们在运用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指导工作时，一定要着眼于发展，着眼于未来，要增强信心，提高勇气，积极主动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胜利。

（七）阶级分析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现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

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①又说：“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②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指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依据，分析每个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察其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认识上就是要以阶级观点去看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要贯彻执行阶级路线。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任何超阶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没有的。因此，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只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才能透过纷繁复杂、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运动的规律性。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 这就是说，能否正确区分敌友我，能否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对于革命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首要问题，就必须了解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变化的情况，分析它们的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及其可能的变化，然后才能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解决社会革命问题，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科学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我们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社会问题，他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提出要弄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要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毛泽东同志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重性的科学分析，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和一系列逐步过渡的形式，胜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通过分析农村各阶级变化的情况，尤其是把中农区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制定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阶级路线。从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农民群众的大多数，调动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团结和教育了中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富农和原来的地主分子对合作化的反抗，使我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生动范例。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结果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说明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

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而我们还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问题，对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实行革命的专政。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只适用于分析阶级现象和阶级关系，不适用于分析其他现象和其他关系。所以，绝不能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第 四 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重大贡献，除突出表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外，在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各个部分都作出了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同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表现的独创性紧密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创立革命学说，而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不是创立科学的哲学问题，而是如何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是通过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来实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纯思辨的工具，而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同偏离或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左”的、右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这就更加突出地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绝不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作出的理论推导、“加码”和诠释，而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哪些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作些探讨和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在基本理论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工人运动实践的需要，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当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给了无产阶级。他们在批判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

斯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使认识论成为科学的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视认识过程为辩证发展的过程，使认识论成为辩证法的认识论；总结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提出了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些基本原理，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和锐利武器，在哲学发展史上引起了根本性的伟大变革。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在总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概括自然科学新成就的过程中，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提出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提出了认识论的三大结论，特别是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以及实践高于认识的观点；提出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的思想；提出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等等。列宁的这些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哲学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来看，这种理论上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中特别是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关于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的思想；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关于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关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不但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而且在实践上体现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轨迹，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辩证过程。

（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起了根本的革命变革作用之后，列宁又深刻地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些基本原理，并从理论形态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又特别强调和突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特别重视和突出了实

践第一的观点呢？从理论根据上说，固然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一最直接最迫切的实践需要所决定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就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这个客观实际，搞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正确地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现实的迫切任务。正如列宁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把理论变为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以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②但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呢？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解决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照抄照搬呢？还是把它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行动的指南，并从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中获得正确认识，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界”和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态度、两种方法的对立和斗争。这两种态度、两种方法的对立和斗争，归根到底，就是遵循“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还是遵循“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去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遵循“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出发，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求得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

“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不但要求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一切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且要求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一切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们，“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从他从事革命活动时起，就非常注重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同偏离和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本主义”进行了斗争。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有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也与俄国大不相同的国情。所以，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异常的、极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不能在反复调查研究中认识中国国情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那就根本不可能获得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也就不能制定和实行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对于

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

对于情况极其复杂、特殊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掌握，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观点的生动体现。如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认识，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总路线的制定，对“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规律的认识，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认识，等等，都是在坚持不断实践和反复调查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战胜主观主义思想路线而取得的。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指导革命走向胜利；违背实践第一的观点，必然产生错误的认识，导致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依据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对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的实践经验作出了哲学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

第一，毛泽东同志对实践范畴作了科学的定义和规范，并对实践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和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创。他指出：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实践”，就是“做和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人类的社会实践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活动、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多种形式；其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实践，而生产活动

则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从而阐明了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用实践第一的观点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他指出：认识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通过不断实践和反复总结实践经验来解决，而不能照抄照搬，不能由别人越俎代庖，更不能坐在房子里靠冥思苦想来解决。

第三，毛泽东同志特别深刻和具体地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他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之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以实践第一观点为基础，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论的有机环节系统地贯串起来，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从理论高度上作了全面、系统而完备的论述和阐发。

总之，毛泽东同志不但在理论上特别强调“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而且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坚持实践第一观点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时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阐发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阐发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因而它就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在哲学中的

根本变革推向前进。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个飞跃”

围绕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深刻阐发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而且还科学地概括和提出了正确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个东方大国中进行的。由于中国国情的极端复杂，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敌人的异常强大等等，因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各种实际问题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是简单的、一次能完成的，必须在实践基础上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循环往复才能完成。中国革命实践的复杂性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揭示认识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质，以获得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这就成了在中国条件下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就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偏离或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主观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曾作了重要的论述。马克思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

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①恩格斯也说："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②这就概括地揭示了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认识，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他指出："不仅从物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也是辩证的。"③"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过程、辩证途径作了简要而精辟的概括。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作了具有独创性的阐发，从而更明确、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⑤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和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这样的能动飞跃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升华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③④《哲学笔记》第289、15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思想获得了更科学和更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也使这一理论带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就是由物质到精神，这是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一飞跃时，特别强调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键在于把认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揭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根源。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发展的第一个飞跃，就是由于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的。如果不坚持以实践为基础，不对中国社会进行深而广的调查，不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那就无从取得十分丰富的和合乎中国国情的感性材料，也就不能为认识的提高和发展提供坚实而可靠的基础。还因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① 如果不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那就无从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形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也就无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正是基于唯物地辩证地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在实现这一飞跃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

则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实践则是使两者统一起来的基础。承认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承认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有待于深化，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都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违反了认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教条主义者片面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这是重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犯了把理性认识孤立化、绝对化的错误；经验主义者则片面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这是重复哲学史上的"经验论"，犯了把感性认识绝对化、凝固化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实现认识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不但具体发挥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思想，而且深刻地阐发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并揭露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发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根源。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也就是由精神到物质，这是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一飞跃时，特别强调后一个飞跃较之前一个飞跃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还因为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不但是认识指导实践，发挥认识能动作用的过程，而且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发展正确认识的过程。"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①所以，就认识运动的目的、功能、作用而言，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是具有更加伟大意义的飞跃。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由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这一飞跃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还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角度，指出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必须经过的一些基本的、必要的环节。其一，就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一般性的认识或理论具体化为一定的目的，并依此制定达到一定目的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法。没有这一环节，由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就没有实践目的，就会成为盲目的活动，无从使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其二，就是要对群众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解释，使理论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变成全体成员的共同思想、观念、决心，在最广泛、最深入的程度上切实地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其三，就是要一切经过试验，在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开展的实践活动之前，先进行小范围、小规模的试验，借以得到先行性的检验结果和取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验，以利于全面实现由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些基本的、必要的环节，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正确地实现由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无限发展的辩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证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这一科学的概括，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还把辩证逻辑思维方法运用于认识发展过程的始终，发展了列宁的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把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在具体分析和论述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引入认识论，用群众是实践主体的观点阐明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又从认识论上阐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一科学论断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而且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自觉地应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创造。

（三）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界”，并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原理，从而更突出、更鲜明地体现了“能动革命的反映论”的本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批判旧唯物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就已经论述了主观能动性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实践既是人的感性的“客观的活动”，又是人的活动的主观“能动方面”，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世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人类具有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列宁进一步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 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从实践上强调了主观能动性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论，对什么是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意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以及主观能动性的具体表现等，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更加明确、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③《哲学笔记》第199、200页。

体的论述和阐发。这些论述和阐发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为完善、系统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特别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因为它是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另一重要方面，则是由中国革命实践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政治上极端黑暗，在经济、文化上异常落后，而革命的敌人又异常强大、反动，因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面临着在极端艰险的环境和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优势我劣势条件下，如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以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面临着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幅员广大而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造现实环境，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但迫切要求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迫切要求革命的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扬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无可置辩地证明：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原理，以及关于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观能动性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在理论形态上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表述。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

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个科学的定义和规范，表明了主观能动性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即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两个方面；第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第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表现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凡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就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反之，就是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发挥的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而反对脱离实际、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错误的主观能动性。发扬这种正确的主观能动性，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论述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定要以客观规律、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但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们有无主观能动性和是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变可能性为现实，争取革命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述革命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时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

柏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 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就是决定的了。”② 这些论述，不仅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阐发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辨证关系，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主观能动性理论的重要特点，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给予高度的重视。

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从认识论和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各种具体表现。他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实践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往往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拥有的预见性、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具体地说，一是对客观规律、对事物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和判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的预见性；二是标志人们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掌握和驾驭客观规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主动性；三是表现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审时度势、扬长避短、随机应变的能力，即依据客观情况变化而作出正确判断和采取应变行动的灵活性；四是表现人们依据客观规律和事物发展趋势而具体抉择实施方略、切实规范行动步骤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一定计划性等等。这些精辟的论述，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原理的科学内容，对人们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正确地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是为了革命地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如果说，在政治上能否分清敌我是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的话，那么，在思想上能否正确地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则是能否正确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认识的“两个飞跃”为辩证途径，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样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达到革命地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个重大发展，就是针对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具体阐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新结论，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结果，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添了新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做到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使主观符合客观、认识符合实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①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主观和客观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而正确地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笼统的统一，更不能是抽象的、僵死的统一，而必须是辩证的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为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②的认识发展过程。在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片断、小段都可能被变成直线，从而把人们引到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泥坑里去。所以，要使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避免主观歪曲反映客观，使认识和实践相结合，避免认识脱离实践，就必须做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全部历史，不但充分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新结论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充分说明实现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极端重要和绝对必需的。这个新结论之所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性和具体性。它要求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处理主客观矛盾时，不能停在认识和实践的一般结合上，必须使主观认识同变化着的客观实际相符合，使认识同发展着的实践相一致，即主观认识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实现具

①②《哲学笔记》第203页。

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卓有成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反之，如果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没有做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那就不但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且还会造成革命失败的结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就是这方面的不容置辩的事实。这些事实也一再说明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

对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但要从革命总体上实现和坚持这种要求，而且要从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以及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坚持和贯彻这个认识论的重要原则。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上，都要实现和坚持“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认识论的新结论，在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党内错误倾向的认识根源。毛泽东同志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①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表现为“左”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倾或右倾的各种错误倾向，都是由于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造成的。犯"左"倾错误的人，他们的思想超过了客观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把在将来才有实现可能的理想当作今天的政策，拿到当前实践中勉强地实行，离开了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犯右倾错误的人，他们的思想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能随着客观过程的推移而前进，仍停在原来的阶段上。因此，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能够从认识论上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避免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论上，强调实践第一，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特别是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这就从理论形态上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发展中的显著特色，从实践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

第二节　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分析矛盾和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大贡献，就

是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创立了以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个基本规律和一系列基本范畴为内容的唯物辩证法。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给辩证法赋予了科学的理论形态，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指导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所面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矛盾和俄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因而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他明确地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辩证法就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提出了一个由“辩证法的要素”和一般与个别、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等范畴所构成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并且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运用于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内斗争等各个方面的分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列宁没能从理论形态上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作出更加系统的“说明和发挥”。他计划写专著系统地论述唯物辩证法，但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工程的宏愿而始终未能实现，这就给辩证法学说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运用于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列宁曾经说过：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①由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及其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唯物辩证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问题，做到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对独创性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也就特别突出地在哲学上反映了出来，使唯物辩证法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通过认识和解决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贡献，就是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和其他著作中，不但深刻地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而且还具体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许多方面，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在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给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赋予了科学而完备的理论形态，使对立统一规律成为分析矛盾、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一）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的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同志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

①《哲学笔记》第182页。

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他依据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根据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经验，对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和这一规律本身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同志把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从而更加巩固地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从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给予了进一步的展开和阐发。

毛泽东同志在阐发对立统一规律各个方面的内容时，把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作为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关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概括和规定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和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从世界是物质的意义上作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科学论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或特殊本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刻而具体地论述：一是把列宁的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思想科学地概括为矛盾的特殊性，并从认识的基础、认识的秩序、认识的目的等方面具体说明了研究和掌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说：“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① 二是从物质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上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点和矛盾各个方面的特点。三是研究矛盾特殊性必须遵循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论原则，要有客观的、本质的和全面的科学态度。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四是提出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重要原则和结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则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普遍和特殊，个别和一般的思想，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特殊的联结、转化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②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个别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总结中国革命的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而且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

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之所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外，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辩证法所决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的。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和实践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情况极端复杂、矛盾异常特殊的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离开对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没有矛盾分析特别是没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科学理论作指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运用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并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联结起来，正确地解决了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科学地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又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采取什么样的道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呢？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至为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为一般的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并战胜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从而独辟新径，把普遍性和特殊性联结起来，找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都是同生动地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问题的基本原理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依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历史经

验，提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从而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既互相联结又互相转化的关系，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这一新的哲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科学成果，是毛泽东同志对列宁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新的哲学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的哲学升华。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命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说明了人类认识运动所遵循的“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必然途径；揭示了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哲学基础；它还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实际活动中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锐利武器。因此，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精髓的道理，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精髓的哲学命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解决了如何从根本上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到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二）对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和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时，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特殊性"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毛泽东同志不但分析和论述了物质运动形式、过程、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借以认识和把握各种事物的矛盾特点、性质或特殊本质，而且还分析和论述了事物运动形式、过程、阶段上的各种矛盾和矛盾各方面在地位、力量、作用上的差别性、特殊性，借以从事物发展过程、阶段上区分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具体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时所提出的新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列宁在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从指导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上，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主要矛盾这一哲学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列宁、斯大林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列宁提出的抓"主要环节"、"特殊环节"的策略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和确立主要矛盾的原理提供了思想基础。

主要矛盾的原理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内容之所

以能够提出和确立，其最广阔、最生动、最直接的客观依据，就在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还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确定革命的主攻方向和制定战略目标，以及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实现革命战略策略的转变所取得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官僚资本主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有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等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此等等。这些矛盾不但在性质上不同，各有特点，而且在地位、力量、作用上也是不平衡和有差别的。在同时存在的诸种矛盾中，有的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其他的矛盾则居于服从的、次要的地位，不起决定作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种矛盾和矛盾各方面在地位、力量、作用上的不平衡性或差别性，表现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区别，使中国革命的发展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这种生动而实际的客观辩证法，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就使人们获得了对于矛盾特殊性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根据。

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不同发展时期的主要对象、主要任务和战略策略转变的过

程，实际上就是关于主要矛盾的原理形成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这个原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得到确立和获得理论形态的过程。因此，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和确立的主要矛盾的原理，是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客观辩证法，依据中国共产党把握主要矛盾、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和完成革命策略转变等丰富经验而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不但对主要矛盾这一概念赋予了科学的定义，对事物发展中各种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性或差别性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且还对各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给予了科学的论述。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②由于事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地位、力量、作用上的不平衡性或差别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因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主要矛盾转化为非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则转化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原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事物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深化。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制定战略策略和把握斗争重点的需要，还进一步地分析和揭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示了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不平衡性、差别性，深刻地论述和阐发了关于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不但不能把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有矛盾平均看待，必须区别为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而且也不能把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平均看待，必须区别为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情形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主要的矛盾方面转化为非主要的矛盾方面，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转化为主要的矛盾方面。毛泽东同志这些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和运用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把握斗争重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② 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自觉地掌握这些科学原理，在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矛盾中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矛盾诸方面中把握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面，就能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做到审时度势，依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正确地制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方针，在战略总体上确定主从、轻重的实施方略，安排先后、缓急的行动步骤，运筹帷幄，统率全局，争取斗争的胜利。同时，根据革命和建设中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况，自觉而及时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策略转变，使斗争能够不断地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依据之一。毛泽东同志提出和确立的这些科学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的发展。

（三）事物及其过程的矛盾发展具有阶段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两种状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依据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转化的原理，分析事物运动所表现的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状态的转变，深刻、具体地阐明了量变质变的辩证过程，并揭示了量变质变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事物发展即矛盾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量变质变的辩证过程。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事物发展的量变质变的辩证过程为依据，阐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科学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量变质变的对立统一，对事物发

展的阶段性作出了科学的表述，并提供了实际的范例。马克思曾分析了由商品到货币的发展经历了个别价值形态、扩大的价值形态、一般的货币形态、货币价值形态等四个阶段。恩格斯在分析动物中的蝴蝶、植物中的麦子等发展过程时，揭示了这些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区别。列宁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表现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后继者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发端。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呈现出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所开拓的前所未有的广阔而深刻的领域，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则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和确立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提供了最直接、最实际的依据和前提。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其他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在战略上确定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推翻三大敌人，就成为改造旧中国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党内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因而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战略步骤、观点和态度都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抹杀了由中国社会根本矛盾

所决定的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不间断性或连续性，在这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革命阶段之间横上一道万里长城，妄图使中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坚持思想上的不变论和政治上的革命停顿论。“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否认由中国社会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呈现的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抹煞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企图使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际过程中矛盾发展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法，正确地制定和实施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步骤，并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其他各种矛盾发展显示出的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对中国革命过程各阶段的实践经验作了哲学理论的概括，提出了关于事物发展即矛盾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

性来。”① 这一论断，不但阐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发展阶段性的客观性、普遍性，而且揭示了事物和过程的发展是通过由量变到质变实现的，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事物或过程矛盾发展各个阶段的相继推移完成的。因此，这一理论就以它新颖而精湛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质量互变规律。这主要是：第一，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论述给予了哲学意义的论证，并赋予科学的理论形态；第二，它不但科学地说明了事物和过程的发展是由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决定的，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和过程的发展是由矛盾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决定的，从而揭示了量变质变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第三，由于它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和过程的矛盾发展是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因而也就更具体、深刻地论证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的理论。

事物和过程矛盾发展阶段性的理论，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中国共产党依据这一科学理论作指导，从中国社会性质和根本矛盾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 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四个阶段，历时二十八年，终于解决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三大敌人的根本矛盾，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建国以后，我们又依据这一理论的指导，按照事物和过程矛盾发展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辩证法，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有步骤地分阶段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事物和过程矛盾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规定战略任务和策略原则，实现变革自然和社会的哲学理论根据，是避免“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

（四）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波浪式的”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①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对这个规律作了进一步的论述，阐明了辩证否定的本质、特征、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概述了发展“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某些特性、特征”、“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②，并确认这是辩证法的“要素”而列入他所构思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纲要中。他不但对这一规律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且还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②《哲学笔记》第210页。

它作为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活动中，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科学概括，特别是依据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肯定和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这一规律的有关内容作了新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事物发展的前进性、曲折性，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毛泽东同志在阐发这一规律时，特别突出地发展了关于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这一重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事物发展的波浪式，是从事物发展的横向形态上表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独创性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以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来表述和阐明事物发展的趋势、道路问题，是从纵向形态上揭示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① 列宁在论述事物发展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时，也指出"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性、特征"，从纵向形态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毛泽东同志对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有时表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更多的表述为波浪式的前进发展。他不但从纵向形态上阐明事物发展的上升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而且更多地从横向形态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揭示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过程。这就在总体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向、道路，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事物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的理论，从实际内容上看，这是对事物发展道路、趋向的普遍性更为深刻的揭示；而从理论上说，它从横向形态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这是对事物发展趋向、道路作出的独创性的概括，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重要内容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大量的著作和讲话中，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的客观性、普遍性，作了极其明确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他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种波浪式前进既是客观的，又是普遍的。在自然界中，诸如光波、电波、声波、水波、热浪等事物或现象的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而且天体运动、地壳变易、生物进化等也是波浪式的。在社会领域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由适应到不适应、又由不适应到新的适应的不断相互交替、循环往复，是波浪式发展的；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波浪式的；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更迭，也都是波浪式的。在思想领域中，如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是经常存在的，人们通过实践，可以逐步达到主观符合客观，但随着客观事物的继续发展，又会出现主客观的不一致，这又必须在实践基础上达到主客观的新统一，这说明人的认识的发展，也同其他领域的一切事物、现象或过程一样，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事物发展波浪式的客观性、普遍性的论述，不但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内容，而且更彻底和更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客观的、普遍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运用波浪式发展的辩证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又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以波浪式发展的辩证思想，指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从而正确地指导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并以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经验论证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同样以波浪式发展的辩证思想为指导，提出“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②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同志同样运用波浪式发展的辩证思想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必须遵循发展、整顿、再发展这样的波浪式，强调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不同发展的速度，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他再三教育干部，要自觉地按照事物发展的波浪式指导运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要有进有退，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这些论述，深刻而具体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及其客观性、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9页。

遍性。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事物发展波浪式的辩证思想，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这主要是：第一，明确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在实践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和防止形而上学的直线式的思想方法。第二，明确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在实践中就必须自觉地遵循事物发展的道路、趋向，走“之”字路，推动事物的发展。因为事物的发展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曲折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① 第三，明确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树立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所以要求无产阶级要有不畏艰险，不怕曲折的革命坚定性和乐观精神。总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波浪式发展的辩证思想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 列宁也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③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尖锐性和特殊性，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情况的错综复杂，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出色地发展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此外，对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和外因、原因和结果、本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和自由、内容和形式、可能性和现实、全局和局部、主流和支流等一系列重要范畴，都有丰富和发展。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生动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① 他们找到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因，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他们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类矛盾问题，作过某些科学的预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②；他们还科学地确立和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的观点和原理，解决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指导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

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原理，指出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类矛盾问题，作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灭，矛盾还会存在”的论断，并指出社会生活中工人阶级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苏联埃政权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 同时，列宁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在几个重要方面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这主要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贯串于每一社会形态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理论；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具体发挥了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理论，系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并创造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这几个重要方面，作为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内容，也如同认识论、辩证法一样，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通过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作出的哲学概括。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并贯串于每一社会形态始终的最基本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是对一切社会发展总根源的科学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引起社会革命、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替，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前进的最终的动因。这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历史。所以，唯物史观的这一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的理论武器。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理论为指导，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理论。从中国革命过程的总体来看，必须认识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应该以什么作为最根本的客观根据和原因，找出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确定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从而揭示革命的具体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应该如何按照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以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理论，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最根本、最深刻的客观根据，具体分析、研究了这种矛盾运动的特殊性、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了夺取革命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对于后一个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統一规律，分析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按照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深入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中寻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说，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论。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有其坚实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最直接的根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理论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作的论述，虽然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提示人们从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去认识社会革命的最终根源。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异常特殊、情况异常复杂，因而容易造成只注意表现多种多样、纷纭复杂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而忽略在这些矛盾后面横贯纵串于整个社会的东西。就是说，忽略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矛盾中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

展的总的和最终的动因。鉴于这种情况，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提供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同志不但坚持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社会发展的原因，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①而且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从而创立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说明了社会基本矛盾既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以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同时批驳了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念，给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为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总根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由于他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唯心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6页。

史观；因而他们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时，则比较侧重于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则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坚持唯物主义前提下，强调辩证法思想，全面地论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的反作用，尤其是强调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力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①这一思想，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展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的内容。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发展的深刻认识，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性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一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原则性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论述。斯大林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虽然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有矛盾，如处理不好，还会发生冲突，但是总的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陷入形而上学的无矛盾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不仅影响了苏联，也影响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具体深入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理论上澄清了糊涂观念，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②。他以前所未有的新义提示人们：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和以前的阶级社会，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只能采取根本变革社会形态的社会革命办法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6页。

社会，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由于社会基本矛盾不表现为阶级对抗，还由于解决矛盾的自觉力量、积极因素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之中，因而可以通过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逐步发展、完善的办法，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地调节而得到解决。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和以前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教导人们从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自觉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论述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列宁也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列宁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独创性地提出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本质和形式多样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因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特点，使通过革命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具有不同的形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独具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形式。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以中国的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俄国的国情，特别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和阶级关系为客观依据而科学地概括出来的。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人民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传统，在外部又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没有民族独立；由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人数虽然较少，但很集中，并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等等。这样复杂的国情、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决定了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国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家政权，就不能不具有中国特点和具体的形式。在中国建立一个既能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能有效地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人民政权，就成为顺应国情、合乎民心的社会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在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式、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的高度来论证。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②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系统、全面而又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根据这个学说的基本精神，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的是无产阶级路线，担负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同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页。

发展，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形式，有两个重要的、突出的特点。其一，表现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具有广泛性，而它的压迫对象则限于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在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则压迫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其二，表现在人民民主是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专政是对极少数的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则是对极少数的敌对分子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既提“专政”又提“民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并行使对敌人的专政。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表述了民主和专政的结合，在实际作用上实现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相结合，又体现了处理敌我矛盾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重任务的高度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它突出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职能，既能高度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又能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这样，就可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意志和需要，增强人民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各种矛盾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转化，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

（三）“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无阶级的社会里，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从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带有由有阶级向无阶级过渡的社会发展的特点，具有不同的表现和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表现的复杂情况，提出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独创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就是因为他正确地回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带有时代要求、特点的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有两类矛盾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形而上学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没有矛盾的。但现实生活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着矛盾的。因此，从理论上科学地解答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一个是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和

解决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具体地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情况，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具体地分析和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说："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① 这就明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

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的独创性，还表现在这一学说以前所未有的明确性和具体性，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区分两类矛盾的客观标准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敌我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抗性的矛盾；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7、336页。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发生的，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具体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不但包括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说来，除有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不但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而且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客观标准。毛泽东同志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和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 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标准，从而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尽管两类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容混淆的，但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被剥削和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28页。

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①因此，从理论上懂得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就能在实践上注意防止形而上学，提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自觉性，从而创造条件，促成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然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又说：“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根据这个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由于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一般说来，采取专政手段以处理敌我矛盾，运用民主方法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总的原则。根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根据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34页。

政治生活主题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公式，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按照这个总公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通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但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因而在解决方法上就必须根据不同的矛盾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从几个方面提示了带有普遍意义和作用的方法。这就是在政治上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处理经济利益问题上，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在处理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在发展科学文化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社会问题上，要在坚持广泛的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发布各种适合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的方法，等等。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这些方法是可以交错使用，相辅相成，共同发生作用的。这样，依据重要的原则和采取带普遍意义和作用的措施，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表现和处理方针、方法的论述，构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系统理论。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把群众观点系统化和彻底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实行群众路线。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毛泽东哲学思想依据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论述，不但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决定力量，同时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唯物史观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作出的独具特色的贡献，就是把群众观点系统化和彻底化，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富有创见的思想是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着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如何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启发群众革命的觉悟，从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大国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胜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彻底的群众观

点和科学的领导方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正是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群众路线，从而解决了上述两大问题，卓有成效地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观点，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他们早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就指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此后，他们又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决定作用，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②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③”。斯大林又把列宁的思想具体化，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所作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发，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他还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把人民群众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③《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创造历史的观点同人是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从改造世界、创造世界历史的全面意义上论述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作用。他还把这一思想推向更高程度，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这就极其深刻地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并把这一原理系统化、彻底化为群众观点。主要是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其中，最根本的是一切依靠群众和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些观点极为深刻而具体地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即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彻底的群众观点，则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实践活动中，都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众路线的问题。

群众路线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而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实行的根本路线。它是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同强大敌人和无数困难作斗争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不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的统一，而且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群众路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的胜利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已作了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叙。

第五章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党和国家就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我们党坚持从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为指导，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新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经过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积极工作，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我国的国情，科学地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这次大会不但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全面规划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独创性地解决了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矛盾问题。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地提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建设高度

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同时，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强调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方针。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这里，我们着重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上，对几个主要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节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直观性、表面性和被动性，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

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中，把“生活、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艰难复杂的实践中，以论述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中心撰写了《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

认识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所遵循的一条普遍真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进而把“最高指示”当作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人们的思想中发生了许多疑问。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还是某种“思想”、“理论”、“最高指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本应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鼓吹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生活的混乱状况原封不动的继续发展下去。实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正确的东西受到压抑和扼杀，错误的东西得到支持和发展。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违反事物发展方向、倒行逆施的东西，即使用政治的高压手段强行推广，也只能在短时期内发生作用。正确的、新生的东西必将冲破一切阻力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任何人企图阻挡它的前进都是不可能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为使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走上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必须首先拨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拨乱反正。正因为这样，本来早已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解决，为列宁、毛泽东所捍卫和发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一场反映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哲学思想大论战是不可避免

的了。所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坚持“两个凡是”标准的争论，也就成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领域中反映两种政治倾向和两种经济发展趋势的斗争。从哲学思想来说，这场斗争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唯心主义先验论、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从政治观点来说，这场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前进，还是在林彪、江青假马克思主义毒害下倒退的问题。可见，哲学上的这场争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两个凡是”是一种“左”倾思潮。它在思想路线上就是新的“本本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继续推行教条主义和制造个人崇拜。实际上，它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所建树的功勋是永存的，不可磨灭的。他的正确主张、决策，我们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加以科学地运用和发挥。但我们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指示，我们就不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决策，我们就不能“坚决维护”。这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恰恰相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后，引起了国内各界强烈的反响。于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举国上下，各条战线，都被这场讨论之风所席卷，迫使各级领导同

志和每个党员都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但是，坚持和推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同志却极力阻止这场讨论，反对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这次讨论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果，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家联系历史和现实的许多实际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比较和综合，认识到实践是判断是非、评价真伪的唯一标准，理论、思想、学说无论怎样正确而又被群众所公认和信仰，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种以“语录”、“顶峰”、“两个凡是”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必然导致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因此，党中央把实践看作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并贯彻到一切领域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彻底性的表现，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实践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二）重新确立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在全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这条思想路线，需要有各方面的条件来保证。比如，要有一大批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精通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支持；要有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机构等等。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果思想路线不对头，以主观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它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然是脱离实际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这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会给党和国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对此，我们党是深有体会的，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引以为戒。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主观主义，导致政治路线的投降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主观主义，导致政治路线的冒险主义，都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分析和综合，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遵循了这条思想路线，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党基本上遵循了这条思想路线，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我们有些同志，其中包括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领袖在内，在指导和处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实际问题上部分地离开了这条思想路线，也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失误。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党和国家制度上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和不完善的地方以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破坏党的思想路线长达十年之久，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思想路线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

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可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同时，清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才能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盛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并且被林彪、江青一类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来歪曲和篡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所以，必须破除个人崇拜，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清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

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新的和旧的个人崇拜以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因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是端正和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改进领导方法、工作作风的基础。所以，重新确立和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由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就有了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勇气，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我们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在内，作历史的、正确的自我批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全面的清理；同时又坚决地维护了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此后，我们党又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样做的结果，既分清了是非，又加强了团结，为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①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正确开展反对“左”和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为了胜利地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各项任务，党中央总是强调要注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前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就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如果思想不解放，不能冲破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那就无法拨乱反正，也无法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重要体现。如果我们不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生搬硬套外国的模式，那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就无法胜利进行。

为了达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前实际情况相统一，为了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过程中，时刻注意了正确地开展反对“左”的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防止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使我们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我们党既坚决反对极“左”倾向，又坚决反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偏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精神污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我们党既客观地历史地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一生不朽的伟大贡献，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既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又坚决反对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的右的倾向。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党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我们既坚决反对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的错误思想，也时刻注意防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总之，党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的和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各项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同时，这也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二节　坚持对立统一观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问题

我们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六年多的时间，但所取得的实践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已经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解决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十条方针和四条重要原则。它们处处闪耀着社会主义经济辩证法的光辉。这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运用于指导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反映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中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是由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党的“八大”对这个客观必然性作出了正确的反映，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主要是由于党在指导

思想上发生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的严重错误以及发动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给党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除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再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即使出现了外敌入侵的战争局面，也要进行为战争所必需和所容许的经济建设。这就是说，一定要始终不渝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针贯彻到底。党中央的这个战略决策，完全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

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到"十二大"，党中央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我们聚精会神、紧张严肃地工作，从思想、政治、组织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有秩序有步骤地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如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工业生产中，实行经济责任制，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以不同程度的经济决策权，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管理经济等；在农业生产中，实行联产计酬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加强社员的民主管理等。因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稳步地持续发展的好形势。

在很短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之所以出现这样好的形势，就是因为党中央根据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制定和实行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路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是经济建设中的唯物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矛盾，调动人民群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经济建设中的辩证法。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既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又体现了我国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如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有一个认识过程；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经济建设的道路、方针和发展经济的战略也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几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经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而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又不长，又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也不很丰富，因而给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更加感到艰难，不得不在摸索中前进。比如，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新路子的认识，是经过三十二年的实践，在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对过去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速度、效益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

比较、反复和综合，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之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子的认识，就是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速度一定要比较实在，扎扎实实，比例适当、协调，实现动态平衡；经济效益一定要比较好，降低劳动消耗和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多出优质、适销、对路的产品，作到少花钱多办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所以，这条新路子的提出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这条新路子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他们强烈要求社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这就需要制定和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以主人翁的劳动姿态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加社会产品，用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把人民群众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望变成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那就不可能出现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局面。最近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沿着这条新路子走下去，时时处处注意做到主观能动性同客观规律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能把我国经济建设搞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走到世界先进的行列。

（三）提高经济效益问题是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也应这样。首先要注意分析各种经济矛盾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从中找出起领导、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然后采取有效措施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并带动解决其他矛盾。

我们分析和研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不能离开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因为经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受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和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和各行各业中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而我们分析和研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就要以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指导，以便准确地捉住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什么是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呢？这要从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出发，先找到什么是决定或者阻碍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再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作出判断，得出正确的认识。1981年11月，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

想”，“直到现在，不少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不仅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且低于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因此，“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当前，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工业布局和经济布局都不很合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这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障碍。”① 赵紫阳同志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这就阐明和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我们认为，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提高经济效益同我国现实的经济结构不很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病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实质和核心问题，就是通过经济改革，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领域中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党和国家根据主要矛盾确定工作中心的基本原理，提出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体现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艺术和远见卓识的才能。只要我们遵照这一基本思想，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核心问题，把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改革工作做好，就一定能够取得可喜的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

---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07页。

（四）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经济建设也是这样。它是客观存在着的许多不同性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是充满着多层次、多结构的种种矛盾关系的复杂系统。同时，人们对经济建设的认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只有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逐步解决。因此，正确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解决各种矛盾的方针、原则，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就是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基本原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经济建设经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的体现。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同时

特别强调了要注意解决的四个原则问题①。在这些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党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辩证法。概括地说，主要是以下八项矛盾的辩证关系。

第一，量力而行和积极奋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②量力而行和积极奋斗是一对矛盾。从对立方面看，量力而行和积极奋斗，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另一方面，量力而行和积极奋斗又是统一的，是在从实际出发基础上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积极奋斗，不能脱离实际地盲干；又要有首创精神，努力工作，多办事，办好事，决不能消极等待。如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量力而行的。同时，又要看到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的自觉的能动性，自觉地把量力而行和积极奋斗辩证地统一起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保证"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一要吃饭和二要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

---

①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0页。

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① 吃饭和建设是一对矛盾。物质文化生活要改善，这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建设要搞好，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吃饭和建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吃饭，一定要吃饱，但不能吃得太好，要留有余力进行建设；一定要建设，但战线不能搞得太长，影响人民生活。吃饭和建设是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在经济工作中，注意解决吃饭问题，关心人民生活，就能更好地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搞好建设又将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因此，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切实解决重点建设和改善生活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分清轻重缓急进行重点建设，为此，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同时改变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另一方面，要继续改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只能靠发展生产，励行节约，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只有这样，才能把吃饭和建设、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辩证地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第三，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

“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六五”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励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七五”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到“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将全面高涨，发展速度肯定会比八十年代高得多①”。效益和速度也是一对矛盾。在过去的经济工作中，往往发生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就忽视发展速度；强调发展速度又忽视提高经济效益，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把效益和速度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要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又要在这个前提下力求达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发展速度。当然，不顾经济效益，不讲究产品质量和数量，用高消耗去换取人民得不到实惠的写在纸上的“发展速度”，我们不能再干了。但是，如果不在保证经济效益前提下力求可以达到的发展速度，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处理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这对矛盾时，既反对不顾经济效益只图虚名的倾向，又反对不力争保证经济效益前提下可以达到的速度，在经济工作中把效益和速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

第四，战略重点和全国一盘棋

“十二大”报告指出：“应当看到，如果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即使一时一地有某些发展，也难以实现供产销的平衡，因而不能持久。我们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②重点和全面也是一对矛盾。在经济建设中，要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发展辩证地统

---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第20页。

一起来。这就是通观全局，保证重点建设，又要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牢牢抓住战略重点，把重点建设搞好了，就会带动整个建设的全面发展；照顾地方、企业的需要，搞好战略全局，就能更好地解决战略重点。重点和全面的辩证统一，就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办事，既可把战略重点搞好，又能把国民经济的全局搞活，使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第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二大”报告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① 在我国，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正确地解决国营经济同其它经济形式的矛盾问题。这是由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坚持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这是保障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另一方面支持和指导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城乡知识青年和居民集资经营的合作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只有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合理配置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①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是这种必然性的体现。

第六，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

“十二大”报告指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②虽然市场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是对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的补充。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地解决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矛盾。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把两个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就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地发展。既要加强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又要注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否定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辩证要求。

第七，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①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地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矛盾。一方面，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才能消化和发展外来的东西。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搞闭关锁国；在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过程中，绝不能丧失国格、人格，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只有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地发展。

第八，责任、权限和经济利益

“十二大”报告指出：“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② 责任、权限和经济利益也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要承担经济责任；另一方面，要赋予企业一定的经济权限，给企业和职工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把责任、权限和经济利益有效地结合起来。坚决改变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使企业和职工都有办好企业、挖潜的内在动力。

---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6页，第22—23页。

在企业、职工中，一定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把生产的好坏与经济利益的多少联系起来，把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同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联系起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实行责任、权限和利益的统一，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环节。

上述四个问题，即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子、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和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活生生的经济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它体现了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经济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第三节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设”及其同高度民主建设的关系

为了胜利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思想、政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①

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的科学表述，是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工作的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两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两个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党和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原则，这是非常正确的。抓精神文明建设，决不排斥物质文明建设，而是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投资、科学技术知识、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等条件；抓物质文明建设，也决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而是为精神文明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决定力量。建设精神文明不能靠自发性，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自觉性和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在这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决定作用。如果我们忽视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人们的精神状态变坏了，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理想、目的和精神动力，反过来又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就有变质的危险。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经常注意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除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文化建设的发展，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能够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

辩证地结合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劳动者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要求，就是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上，强调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承担者，是"两个文明"辩证统一的体现者。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逐步实现自身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提出实现自身革命化、现代化的要求具有战略意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有四个内容：其一，在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方面，要体现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理想、信念、情操，不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具有团结互助、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风尚，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二，在科学知识、文化素养方面，懂得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熟悉本专业的科学知识，还要懂得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知识；其三，在生产技能和经验方面，掌握本专业的现代生产技术并能实际操作以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或反映物质资料生产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其四，在生产环境和工作条件方面，使用和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使工作和生活条件科学化，有利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四个内容的有机统

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革命化、现代化。只有实现人的革命化、现代化，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的体现者。所以，没有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化、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胡耀邦同志说：“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至全体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关系。”①又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党员应当首先在思想道德方面起模范作用。”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必须发挥模范作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二）两个文明建设和一个高度民主建设

“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③这就非常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两个文明建设，都不能离开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通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没有人民群众的高昂的劳动热情和首创精神，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因此，我们还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以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相继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草案、新的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同时，根据我国民主建设新成就和已经确定的方针，重新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许

多重大问题做了新的规定，已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这部宪法的通过和实行，将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高度民主；而政治上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则必将保证和支持“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把“两个文明建设”和一个高度民主建设辩证地结合起来，一定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十二大”报告指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①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高举共产主义旗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在现阶段，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帮助劳动者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绝不是要在现阶段就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相反，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社会主义原则才能得到正确的贯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完善。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为了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思想、制度和运动的辩证关系。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我国还远没有完全实现；而作为一种运动，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在我国开始了。这种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什么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因素，如那些为革命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计较报酬忘我劳动和工作的人，指导他们行动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因此，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社会成员的多数人之所以愈来愈树立起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劳动态度、高尚情操、审美观念、组织纪律性等等，就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结果。他们在处理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时，能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时，能够做到讲原则、守信用、识大体、顾大局，互相尊重、关心、团结和帮助，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在处理同外国的关系时，能够做到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卑躬屈节，讲人格、国格；在对待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上，能够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逐步完善、成熟而发展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为这个伟大理想、目标而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战斗。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加强共产主义思

想教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这样做，就会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四）现代化建设和阶级斗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① 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由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我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级阶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曾经正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明确地向全党提出过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实际上很快地离开了"八大"所确定的方针，主观主义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愈来愈强调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条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1页。

件下，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作出了科学的估计，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坚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在我国社会内部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大多数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但也有极少数的矛盾确实是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这是我国现阶段还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我们对于这些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进行坚决的斗争，绝不能掉以轻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研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现象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只要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最后消失，我们就必须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一切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问题。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时刻注意全面地具体地分析问题。我

们一方面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必须做好进行长期阶级斗争的思想准备，坚决执行我们党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与此相联系，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总之，党的十二大文件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辩证关系的理论，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而且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第四节　坚持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理，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在其它著作和文章中总结了建党的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建党的科学理论。列宁在《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和历届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演说中，总结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建设

的经验，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特别是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总结了中国党建设的实践经验，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我们党的现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出了执政党建设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取得了有效的结果。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执政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执政党自身也需要不断地加强建设，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才能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胜利。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是对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鲜经验的总结，也是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新党章，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多年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党的现实状况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对“十一大”党章作了修改，清除了“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中写了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完整、简明地概述了党的性质，既规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终目标，又规定了现阶段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同时，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基层组织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方面作了

许多新的规定；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也作了许多重要的和新的规定。因此，新党章是一部比党的历史上所有党章都更加充实、完善的好党章。我们按照党纲规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三项基本要求去办，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新党章的这些规定解决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体现了党内生活的辩证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新贡献。从执政党建设辩证法的高度来看，我们认为下述几点是新的发展和贡献。

（一）培养和选拔集体接班人是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统一

一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不但要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还要有一条“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执政党要保证自己的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符合干部“四化”要求的、年富力强的集体接班人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呢？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健在而党的正确路线不能保证长期的连续性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指定接党中央主席班的林彪和后来的王

洪文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他们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把自己伪装成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却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另搞一套，炮制和推行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假马克思主义路线，这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连续性。

党的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即统一于由什么人来贯彻执行、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实践，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尤其是接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班，绝不是由谁指定一个人来接替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培养和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集体接班人的问题。因此，那种认为只要选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万事大吉了，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为什么要培养和选拔集体接班人呢？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即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事业。这个人类的解放事业只能靠马列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靠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最有马列主义水平和专业科学知识的、最有实际经验和才能的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的领袖们，带领人民群众英勇奋斗实现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健在时，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所考虑的接班人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从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为了

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必须认真地选拔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党性强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最近两年我们的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有了一定的数量，目前的情况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领着干，年富力强的同志顶着干，后起之秀学着干。同时又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中流砥柱。这不但表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生机勃勃、人才辈出、后继有人，而且加强了党中央领导机构，使中央领导集团年轻化了，有力地保证党的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促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贡献。

（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和实行民主选举制

新党章对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对党的干部提出了比对一般党员更高的要求。党的干部要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敢于同敌对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外的错误倾向；具有民主作风，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监督；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正确地认真地履行职责，而不滥用职权来谋私利。同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这是由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性质决

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导执政党的建设，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和实行民主选举制，体现了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是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切实执行，也是对干部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有许多弊病：政治上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用人上易搞"任人为亲"；组织上易搞拉帮结派；思想上易搞派性；生活上贪图安逸；作风上搞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弊病表明，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带有封建残余影响。因此，党中央决定改革干部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民主选举制，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三十多年执政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的生命肌体新陈代谢规律的体现。所以，我们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新创造、新发展。

陈云同志在"十二大"讲话中说："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① 在其它会议上，陈云同志还多次说过：现在我们老同志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看当前最重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要的责任，就是培养好接班人，培养好了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同志也曾多次说过：培养接班人是培养集体接班人，现在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还不算晚，再过几年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不及了，集体领导的接班人不解决，十年后中国将发生什么问题很难估计。中央领导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高度来认识，足见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此又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只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民主选举制，才能把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人才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保证党的路线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这是执政党建设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三）选举产生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创举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是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咨询，协助党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党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在中央、省（市）委建立顾问委员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它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不但能起到党中央、省（市）委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咨询和建议的作用，而且能起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传统作风以及传帮带的特殊作用。

《人民日报》《用实际行动迎接十二大的召开》的社论写道："十二大还要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三个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于职权、任务不同，因而在党的实际生活中起的作用也就不同。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三个中央组织中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从执政党的建设来说，"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三个委员会是党的建设经验的新发展，也是执政党自身建设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这一伟大创举，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新的影响。

（四）党的作风和党的性质

党作为一个复杂的事物，从一定方面讲，它的性质和作风体现了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党的性质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的性质。党风是党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党的性质是党风的内容。党风好坏直接体现党的本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社会集团。执政党的地位，对党风的要求比非执政党对党风的要求更高，更有新的内容。共产党是国家独立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和指挥者。人民群众看我们的党好不好，是不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就是看我们的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在实际工作中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致，一事当前是先为群众着想还是先为自己打算。夺取政权之前的战争年代是这样，执政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也是这样。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由千百万党员

组成的。因此，党员的言论和行为，说的和做的，虽然受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却直接体现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所以，党风的好坏，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能不能巩固的问题。陈云同志针对党风存在的不良现象说：党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关系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是对党的建设六十多年特别是执政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执政党自身建设辩证法的活生生的体现。我们按照《准则》和新党章办事，就能把执政党的建设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所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政治生活、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到了破坏。这样，就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坏人以可乘之机，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生活不能正常进行。

民主集中制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才能使党的民主生活正常化。集体领导同个人崇拜也是根本对立的。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只有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才能真正实行党的集体领导。我们

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党的生活中，从不否认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大作用；同时又认为，党必须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专断和制造、欣赏个人崇拜。对执政党来说，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反对个人崇拜的实质，就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把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贯彻始终的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如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可称为领袖。这个领袖集团需要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为代表，以便由他集中集体的智慧，并通过他来指导党的工作。但是，他绝不能违背集体意志站在党委集体领导之上发号施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坚决纠正对华国锋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我们党果断、勇敢、坚定和成熟的表现。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都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党委成员都要严格遵守，并要卓有成效地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同时，党员在实际工作中都要在党组织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不得把自己负责的部门和单位当作独立王国，而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彻底纠正无组织、无纪律、搞派性、各行其事的现象。党性和派性是根本对立的。在党的生活中，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我们党是一贯禁止派别活动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组织生活，因而使派性膨胀起来。社会上的派性活动影响到党内，有的领导干

部也成了派性的支持者。对党员来说，只能讲党性，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搞派性，不能讲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通过整风，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坚决把造反起家、打砸抢的和搞派性不改的人清除出领导班子。

我们要经常清除自身的灰尘，永葆革命青春，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各种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在国际交往的复杂情况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小生产习气的灰尘向我们脸上扑来。因而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也就必然存在。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扫掉扑在我们脸上和身上的灰尘，增强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使我们党的肌体充满青春的活力。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贯彻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新党章，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了，加强了执政党的建设，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党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医治自己肌体上所受的严重创伤，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十二大"路线为指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接触和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将丰富多彩的感性

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对新的实践经验做出哲学的新概括，形成系统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后　　记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在江西省哲学学会的组织下，由江西省委党校李克、黄文松、梅亦龙，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余品华，江西大学刘敬诚，江西师范学院唐元棣，南昌陆军学校丁世尤共同写成。由唐元棣同志对全书统稿，李克同志最后修改定稿。

参加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召开的第二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同志，对本书的讨论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对我们修改书稿有很大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因时间匆促，水平有限，本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作　者

1983年 8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SS号=10478276